



2011年1月30日2期

总第六十七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本期目录

【史林一叶】

董国强 1967年南京“一·三事件”浅析

【风云人物】

王广宇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的一些资料

【一瓣心香】

何 蜀 悼张鲁——重读《红卫兵武斗忏悔录》

【文摘】

张 鲁 红卫兵武斗忏悔录

林 达 已经消失的中国“犹太人群体”

【小资料】

老 舟整理 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文革武斗中死难同学名单

【编读往来】

1、《记忆》编辑部关于65期张郎郎访谈及其简介的说明

2、蒋健谈2010年十件事中的毛新宇

3、陈仁德谈周七月文并纠错

【史林一叶】

1967年南京“一·三事件”浅析

董国强

1967年初发生在南京的“一·三事件”，在当地文革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南京地区“保守派”与“造反派”的一次战略决战，同时也是“造反派”内部“好”、“屁”两派之争的前奏。深入考察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不但可以使我们对文革期间的群众派别斗争有更多的了解，而且可以使我们对文革运动本身的复杂属性与多重面相有更深的认知。

然而由于受到现实学术语境与传统史学理念的限制，目前学界对这一历史事件尚无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笔者查阅到现有的两篇相关文章：伍宁的《“文革”初期南京“一·三事件”真相》（《南京党史》2000年第6期）和吴雪晴的《南京“一·三事件”真相》（《世纪风采》2007年第6期），在叙述“一·三”江苏饭店武斗过程方面较为详实。然而由于回避了“一·三事件”的历史语境，混淆了“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概念分野，不提当年中央和省市委对这个事件的定性和处理过程，因而这两篇文章不但没有揭示历史真相，反而造成新的历史记忆扭曲，对我们认知这个事件构成新的阻碍。

笔者三年前发表的《江苏“一·二六夺权”前后的权力角逐》（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7年6月号）一文，对“一·三事件”也有简单涉及。不过由于当时掌握的资讯不够全面，因而在对事件起因、过程的叙述和定性方面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偏差。笔者现根据自己目前掌握的相关历史文献和口述资料，客观地再现“一·三事件”的原始形态，尤其是这个事件的起因与后果。不当之处，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三大群众组织联盟的形成过程及其不同的价值取向

南京地区的文革群众运动肇始于1966年6月初聂元梓大字报在主流媒体公布之后，而各单位群众组织（含“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出现，则大多发生在8、9月份“大串联”的高峰期间。10月份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中央（其实是毛泽东）出于对地方各级党委的严重不满，决定采取更为激进的政策。群众运动因而便很快溢出文教领域向其他社会阶层蔓延。与此同时，各类群众组织间的横

向联合成为一种趋势。

卷入“一·三事件”的跨行业、跨单位群众组织联盟主要有三个：“省红总”、“赤卫队”和“南京八二七”。以下是这三个组织成立过程和一般概况。

“省红总”——

成立于 1966 年 11 月 1 日，全称是“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该联盟组织的发起单位和核心力量是成立于 8 月 23 日的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主要头头包括南大政治系中年教师文凤来、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戴国强、南京市新华书店职工孔繁洁，南大外文系法语专业学生施威、姚金璜、耿昌贤等。该联盟组织下属成员包括大中专院校师生、文化艺术单位中的激进分子和不少蓝领工人群众。“省红总”一成立，便成为南京地区最激进的群众组织联盟，其巨大政治影响一直持续到 1968 年初“大联合”前后。

“省红总”包括很多下属组织，其中派性特征最显著、投入武斗最积极的，是“省工总”和“省红总中专总部”。

“省工总”最初是由南大激进师生发起的全市性工人组织联盟。11 月中旬，上海“工总司”头头王洪文带领部分随从北上告状，在南京作短暂停留，与南大激进师生和其他单位造反群众有过接触（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油印本初稿，第 25 页）。随后南大激进师生串联许多单位的工人造反派代表前往省委请愿，要求成立全市统一的工人群众组织。省委以“工人成立省市的统一组织，中央没有指示”为由加以拒绝。不满的群众于是涌到火车站，准备前往北京请愿。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闻讯后，于 16 日打电话给省委，同意成立“江苏省工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同上第 25 页。另见《张春桥、姚文元、杜平对江苏和南京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讲话》，1967 年 5 月 14 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6）。“省工总”成立初期，下属成员的社会构成主要是市内一些中小型工矿企业的员工，车站、码头装卸工人，各区县所属市政建设工程队的瓦工、木工、管道工，和南京市三轮车协会的工人等等。南大“红色造反队”骨干成员施威、姚金璜、耿昌贤等人是“省工总”的发起者和实际主持者。到 1967 年 1 月 28 日改组之后，“省工总”的领导力量和社会构成才发生显著变化（1967 年 1 月下旬，张春桥曾指示南京造反派头头“江苏工人

造反总司令部组织不纯，不是以产业工人为主力军的”。随后，“省红总”头头与南京军区代表经过研究，决定于 1 月 28 日宣布改组“省工总”。见《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 40 页。经过改组的“省工总”以当地大中型企业中的产业工人为主，勤务组成员包括晨光机器厂“革联”头头朱开地、长江机器厂“红旗”头头鲁学智等人。然而原“省工总”勤务组成员拒绝交出权力。于是形成“新工总”与“老工总”并存的局面。“好”、“屁”之争发生后，“老工总”投向“屁派”。

“赤卫队”——

南京地区的赤卫队正式成立于 11 月 19 日，全称是“南京工矿企业工人赤卫队”。该组织成立的背景是：在 10 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曾向协助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的陶铸汇报江苏省委面临的困难处境。陶铸指示江渭清派人到上海、湖南和广东“取经”，学习当地领导人应对群众运动的方略。此后江苏省委根据各地的经验，一方面与激进的群众组织进行接触，表示积极支持群众运动；另一方面暗中支持保守派群众成立了“工人赤卫队”等组织，与刚成立的激进群众组织“省红总”、“省工总”对抗（《地下省委复辟记》，《工人造反报》，1968 年 1 月 21 日）。省委还为赤卫队提供了大量经费和物资援助（《江渭清御用工具赤卫队罪行录》，《江苏红总》、《农奴戟》合刊，1968 年 1 月 3 日）。赤卫队的成员主体是各工矿企业的党团员、基层干部、老工人、劳动模范和政治积极分子。该组织与保守派红卫兵（“黑字兵”）存在同盟关系。从 11 月下旬至 12 月中旬，赤卫队和“黑字兵”与造反派群众组织采取截然不同的政治路线。当造反派群众组织将斗争矛头指向省、市委主要领导人时，赤卫队和“黑字兵”则将斗争矛头指向省委抛出来的替罪羊——如原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陶白、省社科所负责人孙叔平等人。当造反派群众组织围困省、市委的时候，赤卫队和“黑字兵”则动员群众去保卫省、市委。

“南京八二七”——

这是南大另一个造反派组织“八二七革命串联会”的影子组织，正式成立于 12 月 20 日，成立时包括一部分工人和农民群众，但是其主体依然是大中学校的

师生。该组织领袖人物是南大数学系青年教师曾邦元，数学系毕业班学生张建山、葛忠龙、张式东等人，数学系教辅人员周文昌、生物系调干生袁服武、生物系植物园工人康炳成、生物系实验员李效蟾等。

“南京八二七”的成立，部分源于南大“八二七”与南大“红色造反队”的政见分歧和潜在竞争关系。根据“八二七”领导人曾邦元事后回忆分析，南大“八二七”与“红色造反队”的差异表现为：“八二七”方面的所有决策和行动都以中央公开发表的指示和“两报一刊”社论为依据；而“造反队”方面则会根据各种小道消息和自己对最高层战略意图的揣测，提出更为激进的口号，并付诸于行动（董国强与曾邦元访谈记录，南京，2007年12月13日）。曾的这个说法得到其他一些消息的证实（陈其玢《乌云遮不住太阳，真理永远放光》，《红卫兵报》，1966年11月30日。其他亲历者访谈记录）。这意味着“南京八二七”虽然属于广义的造反派范畴，但与“省红总”相比，其政治立场较为稳健。“南京八二七”召开成立大会时，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副组长张仲良和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谢胜坤出席了大会（《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32页），表明地方当局对“省红总”/“省工总”与“南京八二七”的不同态度。

不过自成立之日起，南大“八二七”勤务组内部一直存在着以曾邦元与张建山为首的两个小圈子。前者的主要成员是党员调干生、教师（含政治辅导员）、教辅人员和工人群众，后者的主要成员是一批激进学生。在“一·二六夺权”前后，在“八二七”内居少数派地位的张建山及其追随者们成立了一个“南大八二七夺权大队”，正式转入“省红总”阵营。

了解了上述三个群众组织的成立背景和政治态度，对于理解和评价“一·三事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一·三事件”前夕省、市委的政策转向

在1966年6月初至12月上旬期间，省、市委领导人对文革群众运动的态度经历了几次变化：在6-7月间，他们按照主持中央工作的刘、邓的指示，向各级学校和文化单位派出大批工作队，试图将群众运动置于省市委的严密控制之下；

7月底8月初毛泽东对派工作队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后，省、市委一方面部署工作队撤出学校和文化单位，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扶植各单位官办的“文革领导小组”的办法，继续对群众运动施加影响；11月初以“省红总”为代表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实现横向联合以后，省、市委又通过扶植保守派群众组织赤卫队和“黑字兵”的办法，作最后的“维稳”努力。与此同时，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在11月19日出席造反派批斗大会昏倒后，随即向中央打报告请求离职休养，住进了南京军区总医院。

然而到12月中旬，地方当局的态度发生了非常显著的转变。导致这种转变的最重要原因，无疑是12月5日陶铸代表中央的表态。

早在11月中下旬，造反派方面因对省委领导的几次公开检查严重不满，挟持省委书记处书记许家屯去北京告状。12月5日，陶铸和汪东兴代表中央接见了南京造反派代表和许家屯。陶铸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全国范围的群众性造反运动，认为“江苏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多次指责江苏省委在十月中旬工作会议后“转变的太慢了”，阻碍了当地文革群众运动的发展。他还原则上同意了造反派方面提出的八点主张（《陶铸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全体代表时的讲话》，1966年12月5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6）。这就是后文所谓“八项协议”的蓝本。内容如下：

(1) 江苏省委主要负责人立即停止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严重事件继续发生，必须对已发生的群众斗群众的事件立即表态，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并作深刻调查，以使工厂立即恢复生产。

(2) 江苏省委迅速地、不折不扣地按中央及陶铸指示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材料问题，要求许家屯负责立即把五月十六日以后，全省所有文化大革命中除十六条规定斗争对象之外的材料全部交出集中封存，按中央指示办事。否则由江渭清、许家屯及江苏省委完全负责任。

(3) 江苏省委特别是江渭清在身体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必须尽快地向全省

革命人民作检查、交代。必须彻底交代省委一手策划操纵的群众斗群众，以及所搞两面派的内幕与活动，并向革命造反派及受迫害者低头认罪，以便使革命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得到逐步清除，解放被压制的群众。

(4) 江苏省委及省级机关必须彻底改变冷冷清清的局面，要公开允许并号召省级机关干部必须到群众中去，揭开省委内部阶级斗争的盖子。

(5) 江苏省委主要负责干部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虚心听取群众揭发批判并与革命造反派之间建立直接联络关系，由革命造反派随叫随到，叫谁谁到。

(6) 省委必须立即责成南京市农村社教工作团集中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满足革命造反派的要求。

(7) 江苏省委从军区总医院不顾军医阻挠，私自抢走江渭清企图挑起解放军与红卫兵之间纠纷，因此要求许家屯责令韩培兴（注：时任省委办公厅负责人）立即公开向革命造反派低头认罪，并责令许家屯交出江渭清目前医院住址。

(8) 要求江苏省委立即解散红卫兵省委直属纠察队。

12月15日，南京造反派以“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汇报会”的名义召集大型群众集会。会上，由许家屯代表省委宣读了与造反派达成的“八项协议”。该协议对上述“八项要求”进行了增补，变成八大项16小点。其中三点比较重要的补充包括：(1)省、市委领导和各级领导干部在群众武斗事件中的责任问题，(2)“黑材料”的清理和销毁问题，(3)省、市委领导与造反派群众组织代表联合办公问题等（《江苏省革命造反派与省委达成的八项协议》，《红卫兵报》，1966年12月27日）。

在此前后，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江苏二号人物陈光在江宁召集地市委书记和部委办厅局长会议，作了一个主题为“猛转、快转、彻底转”的报告。陈光还告诉与会者：“你们一定要支持造反派，屁股要坐到造反派一边去”（《江渭清、

高啸平之流分化瓦解革命造反派罪行累累》,《红色造反报》,1967年8月14日。

《地下省委”复辟记》,《工人造反报》,1968年1月21日)。随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一大批基层单位的党员干部因“收集、窝藏、转移黑材料”受到开除党籍、撤职等处分。仅南京地区就达到数千人(李之荣《十年动乱期间的南京》,未刊稿)。

12月19日晚,南京市委在长江路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有全市基层干部和各造反派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动员大会”,市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副组长郑康做了动员报告。“八二七”代表做了批判发言。随后,郑康与造反派代表达成“十项协议”(《十项协议》,《八二七战报》,1966年12月27日),内容如下:

(一)立即印发:(1)陶铸同志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在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2)八项协议。(3)陶铸同志接见华东工程学院同学时的谈话。

(二)将(19日)大会动员报告大量印发。布置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干部认真讨论执行。

(三)要求省市委立即解散“红一团”、“红二团”、“红三团”、“直属纠察队”、“小八路”、“小飞马”、“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敢革命战斗团”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非法组织,立即逮捕其中坏分子,严加镇压,实行人民民主专政。限令五天答复。

(四)各个革命造反团体所抓的坏分子立即送公安部门,审查处理,公安部门应接受处理。

(五)应立即执行中央指示精神。热烈欢送革命造反派(同学)进工厂串联劳动。对于无理非难拒绝革命造反同学入厂者应立即严办。情节严重者罢官。

(六)对运动期间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反党分子”等的革命群众应立即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对南大“八二七”、“红色造反队”、南工“东方红战斗公社”等革命造反组织及个人(文凤来、张建山等)进行全省市的平反，立即开大会恢复名誉。

(七)对省市级机关革命造反派应大力支持。立即开动员大会发动干部揭发省委问题。明天(20日)晚六时三十分市委负责同志应参加第一次谈判(市委第二工交政治部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队与市委的谈判)。

(八)对于“人民大会堂事件”(注：造反派方面曾指称，在长江路人民大会堂内发现了暗藏的蒋介石画像，并进而指称这是省市委领导人阴谋复辟的罪证)应组织全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进行专案调查处理，并在最短时间内成立调查联络组，设在人民大会堂。

(九)市委应立即动员那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矿企业的领导及所有的基层干部起来揭发省市委的问题。

(十)应要求南京所有单位把所有宣传器材(喇叭等)尽快给革命造反派使用，把省市委的广播器材(特别是喇叭)在全市各大街安装供革命造反派使用。

12月20日，由南大“八二七”发起，在南大操场召开了“南京八二七”成立大会。江苏省委代表张仲良和南京军区代表谢胜坤出席大会，表示支持。当天，“八二七”方面根据“十项协议”采取行动，派人查封保守派组织“南京市警备纠察队”总部(类似“西纠”的中学生组织)。不料遭到对方抵抗，引发武斗冲突。

12月23日晚，由南大“八二七”发起，在人民大会堂、中山东路体育馆等九处同时召开了有数万群众参加的“揭发控诉南京市警备纠察队等组织罪行大会”。省市委代表郑康、省文革代表宋超、省公安厅高处长出席了大会。会上，造反派方面提出逮捕首恶分子、解散警备纠察队等六项要求。郑康代表省市委表态，答应了造反派提出的要求(《为维护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八二七

战报》，1966年12月27日）。

12月29日，江渭清再次代表省委在全市群众大会上作检查，并根据19日“十项协议”精神，公开宣布为造反派组织和个人平反。

上述省、市委态度的急剧转变，无疑使赤卫队和其他保守派群众组织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如果听任这种态势继续发展下去，他们必将继中学生保守派组织“红一团”、“红二团”、“红三团”、“直属纠察队”、“小八路”、“小飞马”、“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敢革命战斗团”之后，沦为新的牺牲品。而要避免这种命运，他们只有绝地反击，放手一搏。此时，他们对造反派的仇恨固然有增无已，对省、市委的情感也变得更为复杂。这种微妙的心理状态，可以部分地解释省、市委在“一·三事件”中调停努力的失败。

三、“一·三事件”的直接起因及简单过程

“一·三事件”的直接起因和过程并不复杂，伍宁等人文章所述大体不差，尽管其表述带有明显的倾向性。

当地“保守派”与“造反派”由对峙走向冲突的过程，概述起来就是陶铸12月5日谈话内容公布以后，造反派方面的宣传造势和地方当局的态度转变，引发了保守派群众的强烈不满。因而在15至17日，赤卫队和大学“黑字兵”总部动员了几千人冲到省委，要求省委撤销与造反派签订的“八项协议”。当省委领导层婉拒了这个要求后，一些保守派成员便仿效造反派先前的做法，挟持省委书记处成员许家屯去北京请愿。造反派方面针锋相对，随即也派出人马挟持另一位省委书记处成员彭冲北上。当时北京已经是造反派的天下。在北京活动的南京保守派代表不但无法接近中央领导人，而且很快被跟踪而至的南京造反派群众武力遣送回南京。遭保守派挟持的许家屯也在北京街头的遭遇战中重新落入造反派之手。

另一方面，南京赤卫队总部于12月21至22日连续召集“摧毁江苏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要求和省委签订与“八项协议”针锋相对的“七项要求”——其核心内容是明确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当这个企图再次遭受挫折以后，赤卫队方面于25日发起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北上告状”行动。由

于“省红总”下属的当地铁路系统造反派组织“铁道兵”的阻挠，大批赤卫队成员无法乘坐火车，只得徒步北上。其后几天，近万名赤卫队成员陆续抵达安徽滁县。中央领导闻讯后，紧急电令地方当局加以劝阻。经过省、市委代表王楚宾（市委书记处书记）、梅村（省文革小组副组长）等人反复耐心说服，加上天寒地冻，徒步北上实在有很大困难，滞留在滁县的赤卫队成员最终同意返回南京。在省市委和南京军区后勤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这批人员于 1967 年元旦至 3 日间陆续被运回浦口火车站和南京城内。

据称在滁县谈判时，王楚宾曾对赤卫队方面提出三项明确要求：一、返宁后大家都回本单位去，不能集中住宿；二、返回南京后，赤卫队不宜马上召开大会；三、省市委临时提供给北上赤卫队员们御寒的 5000 条棉被不能带走（伍宁《文革初期南京“一·三事件”真相》，《南京党史》2000 年第 6 期；吴雪晴《南京“一·三事件”真相》，《世纪风采》2007 年第 6 期）。但这些要求显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至少有近 2000 人因害怕回单位遭到打击报复，集中住进了太平路江苏饭店（伍宁《文革初期南京“一·三事件”真相》；吴雪晴《南京“一·三事件”真相》）。还有一些人住进了中山东路 307 号省委招待所。另外还有数千人暂时驻扎在江北浦口火车站等处（董国强与耿昌贤访谈记录，2007 年 2 月 1 日）。这为大规模群众武斗埋下了隐患。

1967 年 1 月 3 日下午和夜间，驻扎在江苏饭店的赤卫队与“省红总”朝阳区总部下属组织之间发生大规模武斗。这就是所谓“一·三事件”。关于这场武斗的起因，双方当时的舆论宣传各执一词。伍宁和吴雪晴的文章显然采用了有利于保守派的说法——即这场武斗是造反派方面无端挑起的。而且从造反派方面此前制造的一些谣言看，这场武斗蓄谋已久。造反派方面则声称，武斗的起因是赤卫队方面首先无理扣押、殴打了朝阳区总部的几个工作人员，并在造反派方面反复交涉后拒绝放人。“省红总”调集人马攻占江苏饭店，目的在于解救被抓人员（董国强与耿昌贤访谈记录，2007 年 2 月 1 日。《江渭清高啸平之流分化瓦解革命造反派罪行累累》，《红色造反报》，1967 年 8 月 14 日。《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紧急声明》，《八二七战报》，1967 年 1 月 5 日。《南京二十余万革命造

反派在人民广场举行“江苏饭店一·三流血惨案控诉声讨大会”,《红卫兵战报》,
1967年1月14日)。

笔者认为,历史真相可能介于上述两种极端的派性话语描述的中间:1月3日下午,大批赤卫队员集体住进江苏饭店,立即引起马路对面“省红总”朝阳区总部人员的高度警觉,他们的一些人员或是进行抵近侦察,或是前去张贴斥责、辱骂赤卫队的标语、大字报,自然与赤卫队员发生摩擦,遭到扣押。由此可见,在深入探讨“一·三事件”真相时,查明“谁先打第一枪”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双方的这种对立心态和如此强烈的仇恨心理。如果没有业已存在的两军对垒、一触即发的态势,没有一切事情均被上纲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革命与反动的你死我活斗争的时代主旋律,小摩擦便很难激化为大冲突。

江苏饭店冲突爆发后,省、市委先后派出周一峰(省委副秘书长)、岳维藩(市委书记处书记)、洪沛霖(省公安厅长)、李士英(省委书记处政法书记)、陈光赶到现场,试图制止武斗。但是他们的调停努力均告失败。

最终的结局是,数量占绝对优势的“省红总”战士们经过一夜激战占领了江苏饭店。近2000被俘的赤卫队员在短暂关押后获得释放。其中不少人遭到造反派殴打与羞辱。整个武斗造成近千人受伤,其中赤卫队成员占700多。为了防止在浦口驻扎的赤卫队南下增援,造反派方面还采取措施,造成南京市内公交和长江南北航运一度中断。

四、几点重要的补充和修正

“一·三事件”的直接起因和简单过程已如上述,但要正确理解和阐释该事件的属性和涵义,就不能不提到以下两个重要史实。

第一,1966年12月31日晚至1967年元旦凌晨,陶铸、谭震林在北京接见了南京造反派代表和被他们挟持的省委领导彭冲、许家屯。尽管此时陶铸依然试图调和造反派与省委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但是言谈话语之间,肯定造反派、批评保守派、要求江苏省委转变立场的基调非常明显。陶铸还原则上支持了造反派提出的“五项要求”。内容如下:

第一条，强烈要求罢彭冲的官，撤彭冲的职，彻底改组省文革小组，省文革小组成员必须有革命造反派参加。

第二条：江渭清、彭冲等人必须深刻检查交代对南大工作队中革命造反派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注：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是南京军区干部。在1966年6、7月间，他们根据上级指示参加省委驻南大工作队。1966年11月间，他们在群众大会上披露了省委工作队的一些内幕，受到造反派的欢迎）等同志以及省机关造反派的政治迫害。

第三条：省委责成公安厅立即解散一贯违法乱纪的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南京直属纠察队，警备纠察队，红一团、红二团等黑组织，对其中的首恶者及其后台，必须逮捕法办。

第四条：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对于用罢工、破坏国家财产，挑动武斗等手段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事件，省委必须立即出面制止，并且要严肃处理，对其中主谋者及后台要严加惩办。

第五条：江苏省委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陶铸同志在场、江苏省革命造反派和省委书记达成的八项协议。（《陶铸谭震林接见南京大学赴京代表的座谈纪要》，1967年1月1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6）

陶铸的上述言行，与此前12月5日他接见南京造反派时的表态，以及此后中央文革办公室在1月6日给江苏省委的电话指示，实质内容是一脉相承的。这表明鼓励造反派、贬斥保守派、要求省委转变立场，是当时中央处理江苏问题的总方针。伍宁和吴雪晴的文章绝口不提这个事实，只谈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高压政策”，显然无助于我们客观认知“一·三事件”的历史背景和中央的责任。

第二，1967年1月6日下午4时，在中央文革的强力干预下，省、市委负

责人和“省红总”代表紧急达成“九项协议”。内容如下：

- 一、立即追查一月三日在江苏饭店挑起武斗事件的南京市工矿企业赤卫队幕前、幕后的策划者，挑动者依法予以严惩。
- 二、凡参加工矿企业赤卫队的基层干部（党的支部书记、副书记、车间主任和副主任）。要立即一律退出。如果今后他们中间一小撮人在幕前、幕后挑动策划武斗要追查出来，是党员的一律开除党籍，是干部的一律撤职，情节严重的依法严惩。
- 三、以省、市委名义发出通告，立即要外地赤卫队员迅速离开南京，返回本地抓革命、促生产，其中的基层干部拖延不走者按旷工论处。
- 四、省、市委对在江苏饭店发生的武斗事件没有能够制止，是有严重责任的，必须向全省革命造反派和其它革命群众公开检讨、认罪。今后坚决依靠革命造反派采取有效措施，积极作好工作，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 五、要动员离开生产岗位的工人立即回厂抓革命、促生产。凡是中共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下达以后，干部策划破坏生产的要追查责任，坚决处理，造成严重后果的要罢官，其中是党员的要给以党纪处分。
- 六、省委、市委组织慰问团对受伤者进行慰问。
- 七、省委、市委立即和革命造反派协商，固定办公地点。
- 八、认真解决外地来南京的革命造反派的吃、住生活问题。
- 九、在江苏饭店发生的武斗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应由省委、市委负全部责任。（《周恩来与南京大学赴京代表团座谈纪要》附件，1967年1月6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6）

上述协议的许多内容，与此前提到的省、市委领导与造反派达成的“八项协议”、“十项协议”等文件是一脉相承的，是省、市委在中央压力下继续转变立场的一个表现。该协议中对赤卫队成员的处理办法，与此前对涉及所谓“黑材料”问题的基层党员干部的大规模清洗，都是地方当局在形势逼迫下的“舍卒保帅”之计。伍宁和吴雪晴的文章不提前面的几个协议，仅仅援引江渭清回忆录的说法，把这个协议说成一个孤立的事物，显然是企图省市委领导开脱责任。

此外，本文还要对伍宁和吴雪晴的叙述内容做出两点重要修正。

第一、伍宁和吴雪晴在描述造反派的言行时采用了很多负面语汇，尤其是多次提到“八二七”头头曾邦元要为“一·三事件”承担责任。例如在吴文中有如下描述：“……在曾邦元、文凤来等人的策划下，以‘红总’南京市朝阳区分部为主，出动三四千人，手执木棍、长矛等凶器，分别将江苏饭店总店和分店包围得水泄不通……”；再例如，吴文说“一·三事件”期间，前往武斗现场的省委领导“周一峰见此情景，只得再派人找曾邦元，希望他能出面做‘红总’的工作，但毫无结果……”，等等。

说“在曾邦元、文凤来等人的策划下……”，显然有违历史真实。前文提到，在12月中旬保守派挟持许家屯去北京告状，造反派方面随即也挟持彭冲去北京，造反派带队的正是“省红总”和南大“红色造反队”的一把手文凤来。所以“一·三事件”发生时，文凤来根本不在南京，其他在北京活动的造反派成员也对南京的突发事件毫不知情。周恩来在1月6日晚紧急召见南京造反派代表，本来是希望通过他们了解“一·三事件”的真实情况。结果却变成周恩来向他们通报从其他渠道（如江渭清和南京军区负责人等）获得的相关信息（《周恩来与南京大学赴京代表团座谈纪要》，1967年1月6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6。董国强与葛忠龙的谈话记录，2007年4月13日。葛忠龙作为造反派代表，在1月6、7、8日晚三次参加周恩来的接见）。因此文凤来参与“策划”一说实在无从谈起。

至于指责曾邦元以种种借口躲避、拖延对武斗事件的调停，也属不实之词。曾邦元在读到吴雪晴的文章后，曾向有关部门和载文刊物表达了对吴文的严重不满，甚至要和他们打名誉权官司。按照曾邦元的事后回忆，他在江苏饭店武斗发

生后，不但立即应邀随省、市委代表前往现场斡旋，而且还在斡旋过程中被赤卫队从楼上丢下的椅子砸中头部，被送往鼓楼医院抢救（董国强与曾邦元谈话记录，2007年12月13日）。曾的上述说法得到历史文献的证实。后来“好派”报刊《红色造反报》在一篇批判曾邦元的文章中指称：“一·三事件”发生时，曾邦元随周一峰、洪沛霖到现场进行调停。但“省红总”方面的战斗队员对他们的劝说未予理睬。随后，曾邦元被赤卫队员扔下的椅子砸得头破血流，当场昏迷，被紧急送往鼓楼医院抢救。……1月6日，周一峰等人代表省委前往医院探视（《江渭清高啸平之流分化瓦解革命造反派罪行累累》，《红色造反报》，1967年8月14日）。这段叙述，本意旨在揭露曾邦元、“八二七”与“黑省委”、“走资派”的暗中勾结。根据笔者的理解，当时省、市委找曾邦元参加调停，是因为在他们眼里“八二七”与“省红总”同属造反派。如果曾邦元愿意出面讲话，“省红总”方面应更容易接受。

第二，伍宁和吴雪晴的文章还提到，“……曾邦元等人还贼喊捉贼，借机扩大事态，向中央‘文革’告状，诬‘赤卫队’是江苏省委组织部的‘保皇派’……”。这种说法可能基于以下事实：

“一·三武斗”发生后，南大“八二七”曾于次日发出《紧急声明》，表示坚决支持“红总”朝阳区总部和一切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并强硬地提出：“以江渭清为首的江苏省委必须对此严重流血事件负全部责任。我们强烈要求，江苏省委立即交出凶手，由司法部门严加惩办！否则，我们将采取我们认为必要的、坚决的革命行动，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江苏省委和江渭清负完全责任。”

（《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紧急声明》，《八二七战报》，1967年1月5日）

1月6日下午1时，二十多万造反派群众在人民广场举行了“一·三惨案”控诉、声讨大会。大会由“省红总”司令部发起和主持。南大“八二七”、“南京八二七”、南京“红二司”、“红三司”和“首都红三司”、“全国革命造反串联总队”的代表出席大会。大会发言严厉声讨了赤卫队和江苏省委的“罪行”，并发出如下通令勒令：

一、 四十八小时内江渭清出来向革命造反派低头认罪，并亲自探望受害者及其家属。

二、 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必须立即法办凶手，履行无产阶级专政，否则格砸勿论。

三、 江渭清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把所有外地来宁的赤卫队送回原地，并下令解散省委所控制的黑字系统的所有组织，逮捕其为首者，以恢复市内的正常秩序，保障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南京二十余万革命造反派在人民广场举行“江苏饭店一·三流血惨案控诉声讨大会》，《红卫兵战报》，1967年1月14日）

如果了解了曾邦元1月6日在医院里接受治疗的事实，以及“八二七”内部“曾”、“张”两派的分歧，就不难判断曾邦元在上述两个事件中的责任。

公正地说，曾邦元是南京地区最著名的造反派头头之一。在1966年8月至12月间，他与他的同盟者（同时也是潜在的竞争对手）文凤来等人一样，深深地卷入了当地反工作队和反省委的活动。在“一·三事件”前夕，文凤来带人去北京活动，他作为南京地区造反派最高负责人，对当地派性斗争的加剧和社会局势的恶化无疑负有很大责任。然而，将“一·三事件”的责任全部归到他的头上，显然忽略了其他因素——尤其是中央和省、市委的决定性影响。由本文的叙述可以看出，当地文革群众运动的发生与发展，绝不是一、二个来自草根阶层的造反派头头可以左右的。

根据曾邦元的口述，在1967年1月底2月初发生“好”、“屁”之争后，两派代表奉命去北京谈判。曾邦元曾试图将“一·三事件”作为“好派”方面暴力倾向的一个示例。但主持谈判的周恩来随即私下里告诫曾邦元：“一·三事件”主席知道，是革命行动。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个问题了（董国强与曾邦元的谈话，2007年12月13日）。所以，张春桥在1967年“五·一四讲话”中对“一·三事件”的些许赞誉并非空穴来风（伍宁《文革初期南京“一·三事件”真相》。《张春桥姚文元杜平对江苏和南京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讲话》，1967年5月14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6）。

最有说服力的，当然还是当时的文献。在 1968 年 3 月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省革委会控制下的《新华日报》曾发表文章，对“一·三事件”有如下赞颂：

曾记否，在著名的‘一·三事件’中，奋起杀向文化大革命战场的南京工人阶级，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决战的时刻，发扬了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同革命小将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用鲜血谱成了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凯歌……（《毛主席啊，钟山儿女永远忠于您！》，《新华日报》，1968 年 3 月 23 日）

当时在江苏掌权的许世友，一般看来并不是中央文革的同伙。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一·三事件”评价问题上与陈伯达、张春桥保持一致。这难道不说明问题吗？

结论

本文对一些问题的解释与澄清，目的在于揭示文革运动的多重面相与复杂属性。由本文提供的事实不难看出，文革群众运动最初是高层决策和主流舆论导向的产物。群众组织的出现与分化，大规模群众武斗的发生，也与中央高层和地方当局的政治博弈有关。群众派性冲突的不断升级，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阶级斗争”观念的长期灌输，没有中央政策导向的日趋激进，没有省、市委在事变前夕的急剧转变，没有各派群众对可能被打成“右派”、“反革命”、“保皇派”等“异类”的高度恐惧，“一·三事件”就不会发生。试图通过妖魔化造反派来简单解释这样一场流血冲突，对于我们廓清历史事实和吸取经验教训是十分有害的。如果真的希望避免文革悲剧再次重演，我们就应该认真探究并客观展示历史的真相，无论这种真相令我们喜欢还是难堪。

【风云人物】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的一些资料

王广宇

住进钓鱼台

大约在 1966 年 7 月末，王任重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住进了钓鱼台二楼。当时他身兼数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调中央后）、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加上不久前陪毛泽东畅游长江，使他的名声更加显赫。

王任重在中央文革的四位副组长中，排名仅次于江青，称为第二副组长也算名正言顺，可见毛泽东对他的器重。

王任重来北京时，从武汉带来一套班子，设立了自己的办公室，他同中央文革办公室没有联系，王任重的一切事情都由他的办公室办理。

中央文革的办公室、会议室都设在钓鱼台十六楼，陈伯达、江青、康生和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在十六楼议事、开会，王任重只是在开中央文革小组会时才到十六楼。平时他的一切活动都在二楼，他和刘志坚两个人共用二楼，因此王任重的活动，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和康生并不都知情。王任重说毛主席叫他过问北京的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他有了这把尚方宝剑，为他的单独活动提供了依据。

在钓鱼台二楼，王任重的工作非常繁忙，他指导着北京几个重点大学、重点中学的文化革命运动，也兼顾领导湖北、武汉的文化革命运动。他为北京的红卫兵头头们出谋划策，可以说他是一位很有创新精神的副组长，为推进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然而，由于他很快就被打倒了，使文革研究者忽视或回避了王任重在文革初期对发动文革所起到的作用。

我虽然在中央文革小组当过工作人员，但对王任重了解甚少，从未同他单独打过交道。最近看了一些文革回忆录和相关资料，联想到了一些我碰到过的事，对王任重在文革初期的活动多了一些了解。现将有关资料摘编出来，加上我的一些点滴见闻，供研究者参考。

指导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

清华大学是王任重关注的重点，他派了两批联络员进驻清华大学指导运动，在工作组撤离清华后，他用“北京新市委大学工委”联络员的名义，把他从湖北带来的秘书等派驻清华，后来他又从解放军政治学院调来 12 名干部共同组成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联络员，这些联络员由他直接掌控。

1966 年 7 月 27 日，雷蓉（雷任民之女）、王小平（王任重之女）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信提出工作组的问题。第二天，王任重、关锋参加了清华大学关于工作组的辩论会（王任重提前离开）。

就在这天晚上，北京新市委宣布撤销大中学校的工作组。

7 月 29 日雷蓉、王小平贴出第二张大字报，标题是：《6.24 工作组的路线是错误的》。

1966 年 8 月 4 日，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大会（在这个会上，周恩来宣布为蒯大富平反，要叶林向蒯大富赔礼道歉）。刘涛后来说，贺鹏飞在大会的发言稿是经过王任重审查批示的，批示说：“这个发言很好！”

清华大学文革临时筹委会向全校师生提出几点开展运动的建议（“八七建议”），也是按王任重指示搞的。

8 月 10 日，王任重的秘书张生谈、傅明贤从湖北省委调到清华大学、以“新市委大学工委”的名义，任清华大学的联络员，驻进了清华。

8 月 20 日，刘菊芬（刘宁一之女）要揪蒋南翔回清华批斗。王任重一听特别着急，马上派贺鹏飞（贺龙之子）去截，说斗蒋南翔要主席同意，还怕出现武斗。王任重的秘书吕乃强还找刘菊芬谈了一次话。清华的红卫兵也找王任重谈过。

8 月 20 日，贺鹏飞宣布：大家斗黑帮的心情已转告了王任重同志。王任重转达毛主席指示，毛主席要亲自指挥斗蒋南翔。

8 月 21 日晚，刘涛贴出《誓死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大字报，大字报说，要造王光美的反，彻底和王光美错误路线划清界限。关于这张大字报，刘涛后来说：“这张大字报是 8 月 18 日写的，写好后还想写一张刘少奇的大字报。觉得应当请示一下上级，就打电话给王任重。……后来把大字报改了改交给了王任重，他看了后又修改了。他还看了我写的给刘少奇的大字报，实际上，刘少奇那张大字报基本上是王任重授意的。王任重是这样安排我写大字报的：他们先贴《三问

王光美》，然后再贴我那张大字报，他们再表示支持。”

刘涛的大字报贴出后，引起了钓鱼台十六楼的中央文革大员们的重视，当成爆炸性新闻。当晚，由关锋出面向办公室紧急布置马上组织人员去清华大学抄刘涛的这张大字报，顺带也抄贴给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我受命去马列主义研究院急调二十多名工作人员，火急赶往清华园抄写大字报。这些抄写员分散在拥挤不堪的人群中抄大字报，大约抄了十几分钟。清华大学的广播喇叭宣布禁止外单位人员抄写大字报，并派了大批清华附中红卫兵去现场当纠察队，看谁抄大字报就没收，要求外单位人员撤离清华园，同时封锁了校园。

由我带领的中央文革的抄大字报的人员也只好乖乖地收起纸笔，混在人群中，集中后退出了清华园。每人手中都是抄的残缺不全的大字报，似乎没有找到刘涛的那张大字报。

钓鱼台十六楼的陈伯达、江青等人还等着看刘涛的大字报，抄大字报的人却无功而返。十六楼距王任重住的二楼不足三百米，对刘涛大字报出笼背景毫不知情的陈伯达、江青等，以为刘涛阶级觉悟升华而大义灭亲，并要树个典型，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刘涛的大字报出笼竟是自己营垒的副组长亲手导演的。

这件事给中央文革一个教训就是必须掌控高等学校的文革动向，没有可靠信息就要处于被动，于是中央文革决定立即派出中央文革小组自己的记者进驻高等学校，很快就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派出了驻校记者组，其他北京的高校也派了记者，随时掌握高等学校的文革动向。

8月24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了一次在校内“破四旧”和打击“黑帮”、“牛鬼蛇神”的行动，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在贺鹏飞指挥下用拖拉机推倒。贺鹏飞把在清华拍摄的一些大字报底片交给了王任重。刘涛说：推倒清华二校门事件是贺鹏飞请示了王任重才决定的。

(以上有关清华大学文革的材料，非本人亲历部分，均来自邱心伟、原蜀育主编《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

指导北京大学的文革运动

王任重文革中在北大的活动我一无所知，只是在1966年11月，我受命接待

聂元梓，聂在花园村一号叫办公室保存她随身带来的小布包时对我说：“这包里有陆平、常溪萍和王任重的材料。”王力还让聂元梓写过揭发王任重的材料。

聂元梓走红的时候，王任重被批判，聂元梓反戈一击，把王任重多次接见她的谈话内容的笔记本当成了罪证材料，说明王任重对北大的文革运动也有不少指示。《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出版）说，“江青一定要我们写揭发材料，不写就过不了关，我们始终没有讲过王任重的实质问题。”“最后我们避重就轻，讲了些简单的事情”应付江青。

聂元梓回忆说：北大筹建“文革委员会”时，想叫邓朴方当副主任委员，都是王任重的意思，他还叫我做北大骨干分子的工作，使邓朴方当选，但邓朴方还是没选上。

聂元梓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即将结束的时候，王任重把我和彭小蒙（北大附中红卫兵负责人）接到钓鱼台他住的地方（即二楼）。王任重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住在钓鱼台，占了一座楼……专为我安排了一个房间，要我在这里休息几天，说抽时间他和我研究一下北大运动怎么搞法，他还让我以后在这里多住住，休息休息，有时间就过来。我和彭小蒙分别住王任重楼下的房间，不住在一起，彭小蒙什么时候走的，我不清楚，王任重和她谈了些什么，我也没参加。王任重给我讲了那一番话我很高兴。”（《聂元梓回忆录》155—156页）

聂元梓还说：“北大工作组走了，运动怎么搞？我自己也遇到许多新问题该向谁请示呢？正好王任重也要抓住我，他找我也是想通过我关注北大运动。王任重说：中央文革关于大专院校的运动由他来负责，北大运动中一些大事情他来找我。”“这正和我的心愿，因为那时候王任重正是受毛主席器重的，毛主席很欣赏他，说他在各省委书记中，既年轻，又能干。”“我愿意找这样的人谈学校问题，愿意向他请示，我对江青的印象不佳，一直没有多少好感”。“江青和王任重都表示对我的重视，我宁愿找王任重而不找江青。”

“后来，王任重指示成立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北大校文革成立过程中的每一步，我都请示王任重，比如成立校文革人选时，有的事情我直接找王任重，有的事情我是通过他的秘书长吕乃和找他。后来，王任重干脆把刘道玉派到北大来，名义叫工作组长。校文革要采取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就是王任重的指示。那已经是八月下旬九月初，毛主席接见了全国红卫兵，大中学生开始全国大串连时候，

王任重为此进行过多次指示，我们也请示过陶铸，不让学生出去串连。”

“我对王任重很信任，因此，不仅是关于北大如何开展文革运动的问题，我经常请示他，就是别的事情我也想听一听他的意见。”（《聂元梓回忆录》，156-157页）

据王乃英（林杰夫人）在清查“五一六”中写的交代材料《主要活动大事记》说：“聂元梓与陶铸、王任重不是一般关系。后来彭小蒙把这事揭发出来后，她（聂）就要组织斗彭小蒙。”（材料手稿第30页）

指导湖北、武汉的文革运动

湖北武汉在全国文化大革命普遍开展前就已经开始了，是在城乡“四清”运动的基础上，以抓右派的形式搞起来的。

1966年4月18日，湖北省委就向武汉大学派出了工作组，“武汉工作组是全国第一个文革运动的高校工作组”。4月25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委会议上说：“由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文化教育界，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目标要针对知识分子。文革的结果之一，就是要查出占总数5-10%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作为右派。”

6月6日，王任重的儿子王三宝（初中三年级学生）在武汉实验中学贴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字报。大字报说，“武汉市的中学员工里有40%出身自阶级成份不好的家族，学校主要领导人出身不好的达到48%。”

武汉大学工作队认为，王三宝的大字报是“关于文革运动如何开展的内部口径。”

6月8日，王任重重新提出，1957年《湖北省委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几点意见》，作为当前运动的指导文件。之所以借鉴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的经验，是因为刘少奇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这次运动（指文化大革命）可能和1957年差不多，要打击三、四十万右派分子。”王任重在一份检查中说：“这个想法和我的想法一致。”

6月28日，王任重起草了《目前文化大革命形势和我们的建议》报告，强

调派工作组的作用和在知识分子、群众中抓右派的重要性。王任重认为：“多数学校像水利电力学院类型，左、右派在争夺领导权。目前要着重研究解决这一类型的单位，暴露牛鬼蛇神，彻底批倒批臭右派分子。”用“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的方针指导全省运动。

王任重的这份抓右派的报告《建议》，被在京主持工作的刘、邓、陶转批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作为开展文化革命运动指导性文件。在京主持工作的刘、邓、陶以为，“毛泽东在武汉，他们相信毛泽东可能对这两份报告是首肯的。”王任重说：其实，“直到七月十八日，毛泽东离开武汉返回北京，还没决定怎样把刚刚开始的运动进行下去。”

6月13日，武汉大学工作组开始批判李达、朱劭天（党委书记）、何定华（副校长）“三家村”反党集团。由官方组织的批判运动在武大划出来27名“黑帮分子”，内部掌控的91名，武汉大学13名党委常委9人被打成“黑帮分子”，在1222名教职员之中，有227名被公开划为“黑帮分子”。

关于批斗李达为首的“三家村”，王任重曾向毛泽东试探过，可否公开批判李达？毛泽东表示，可交给群众公开批判。7月19日李达临死前给毛泽东写了封求救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可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毛泽东8月10日才看到这封信，他即刻批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陶铸批示：“即送任重同志”。王任重说，毛主席还当面指示他，“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王任重向毛保证：“武大的革命师生不会对李达采取过分行动。”然而，李达终因不堪忍受批斗，含冤吐血而亡。

关于李达被批斗，可能是1966年7月中旬，在钓鱼台十七楼放映室，放映了一部电影制片厂拍的新闻纪录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观看了这个片子。纪录片拍摄了批斗李达大会实况，在一个大礼堂挂了一个横幅标语，我隐约记得是《批判反动地主、反动学术权威李达大会》。大会主持人是武汉大学的领导之一，被批斗的李达对批斗会表现出蔑视、抗拒、不服，他双手拄着拐杖，背靠主席台，面向观众，时不时地反驳几句批判。

7月5日，武汉钢铁公司一工人因打人被判处死刑，运动初期武汉全市有400余人（学生159人）以“反抗、破坏文化大革命”罪被逮捕。

王任重在7月6日省委常委的一次会上说，在武汉市文化界作为右派分子打击的不超过3%，干部和学生不超过1-2%。

武汉华中工学院在37天内，划出了383名右派，华中师院被斗的有300多人，建筑工程学校全校总共500人，逮捕了18人。在全市的几个重点大学内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这些都是在工作组和原党委领导下进行的。

8月下旬，武汉市仿效北京的破“四旧”经验，以武汉市中学生为主体，上街破“四旧”，抄家、游斗浪潮迭起。据不完全统计，在武汉市共抄家21000户，抄出黄金110斤，白银1800斤，银元26.7万块，现金存款440万元，查抄打斗致自杀案件112起，死亡62人，游斗折磨致死32人。

(以上材料来自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群众的文革记忆》)

王任重进北京后，他仍然亲自领导湖北武汉的文革运动，不时发出对武汉文革运动的指示，武汉在文革初期发生的大事件大都得到他的指示或认可。

【一瓣心香】

悼张鲁

——重读《红卫兵武斗忏悔录》

何 蜀

很多年以前读到泰戈尔的这句话时，我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只在虚线画成的轮廓上认识人，这就是说，还有许多必须由我们自己尽量去填满的空隙。”（泰戈尔书信集《孟加拉风光》，冰心译，《世界文学》1962年第四期）

2010年11月14日之后，当我看到官方媒体上那些有关张鲁病逝及遗体告别、追悼仪式的消息时，便又想起了这句话。

在官方的报道中，张鲁有着这样一些头衔：著名电视艺术家，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多次获得者，重庆电视台一级编剧，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左图：张鲁遗像。)



不过，对于认识了解张鲁来说，这些头衔都只是一些干巴巴的虚线。官方自然不会提到张鲁的另一面，不会提到他那篇远比他所有电视剧作品都更重要、更有意义的反思文革武斗的力作《红卫兵武斗忏悔录》。

我和张鲁相识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一个百废待兴、动荡不安、充满希望与困惑的年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随着其发动者和领导者“万岁”的去世，更由于以“文革旗手”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覆灭而实际结束了（用当时中共中央主席的说法是“胜利结束”了）。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个人迷信和左倾顽症的影响，由于历史惯性的作用，人们的思想和心理都还未能适应历史的转变，大量冤案还不能得到平反……就在那些日子里，我在重庆城内的枇杷山上，认识了正被贬在重庆市图书馆整理善本书的前文化部副部长、“大黑帮”陈荒煤。当时我是重庆近郊一家钢厂的青年工人，正热衷于电影剧本的写作，我知道陈荒煤是文革前的电影主管，曾读到过他在文革前的文艺整风中写的有关电影工作的全面检讨。我一心想要从这个昔日电影权威那里学到点有用的东西，便常在周末回城时的晚上，去拜访这位困居于枇杷山上一栋小楼里的老人。在与陈荒煤无拘无束地交谈过几次后，有一天在他那局促的小房间里见到了另一个年轻人，陈荒煤介绍我俩认识，他就是张鲁，当时在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也是因爱好电影文学创作而来找陈荒煤求教的。

张鲁是公认的“帅哥”：高挑的身材，浓黑的头发，红润的脸膛上一对随时都含着笑的明亮眼睛，说起话来幽默风趣，对人彬彬有礼。他是文革时的初三学生，他父母都是军队干部，在山东时生了他，故名鲁。文革前他从江苏转学来到重庆时，因原读的五年制小学实验班，在重庆没有相应的学制，转学时只好跳了级，因而年龄比他同班同学都小，与他哥哥上同一年级。

我和张鲁相识的时候，他正和他的一位同学王松生在合作写一个电影剧本《郑成功》。王松生比张鲁高三个年级（张鲁叫他“松哥”），是文革爆发时的高三学生，正准备报考电影学院编剧系时被文革中断学业，在1967武斗刚升级为枪战时，因同学手中的枪走火，王松生被打断了大腿，这个昔日在学校篮球场上奔跑的健儿从此只能靠假肢才能站立和行走。他们合作创作的方式是：张鲁跑图书馆查资料，回来后两人交换意见，由王松生执笔写稿。我看他们的稿子，已经相当成型，而且在情节特别是在古代战争的细节处理上颇有独具匠心之处。只

是在当时已经有了郭沫若写于文革前的同名电影剧本，虽然那个本子读起来味同嚼蜡但却是大师手笔，他们这个无名小卒的本子肯定不会再有人愿意理睬。他们也并未想到投稿，只是作为一个练笔的习作。

当时电视还没有普及，因此一般还不知道什么电视剧。张鲁在广播电台文艺部工作，这时广播电台开始进行广播剧的创作和播出，但节目很少。张鲁建议我把我刚发表在 1978 年第四期《四川文艺》上的诗《婚礼之歌——纪念周文雍、陈铁军烈士就义五十周年》编成广播剧。发生在二十年代的那两位青年革命者在刑场上宣布举行婚礼的故事，的确极富戏剧性，但我当时对广播剧一无所知，不懂得该怎么写，未能满足他的要求。

因为我们都对文化大革命有过亲历，觉得应该把这个“史无前例”的题材作为我们创作的重点，我们一度曾商量合作创作一部反映文化大革命的电影剧本。我还把另一个比张鲁年龄还小、已经大胆尝试着写过电影剧本的文学青年苑鲁（即现在的重庆市物价局长）也拉了进来。但是当时毕竟对文革的认识还十分肤浅、混乱，在王松生家那六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我们坐在床沿上有过几次并不深入的讨论，基本上没有进入实质性的写作阶段。我在当年简短的日记中查到有这样几则记载：

1978.3.14 晴 星期二 昨晚同张鲁在王松生家谈了一阵，后又同张鲁在街上转了很久，谈创作，打算一起搞剧本。

1978.3.23 阴 星期四 星期一晚同王松生漫谈了一阵，张鲁出差去了。王的学习精神较好……

今天给张鲁和王松生去信一封，谈了些有关合作剧本的想法。

1978.3.29 晴 星期三 星期天晚同苑鲁、张鲁、王松生一起漫谈了一阵。关于文化革命题材的创作没有谈出名堂。星期一下午又同王松生谈了一下午。他倾向于写轻松愉快的生活题材，不太注重政治题材。

1978.4.25 晴 星期二 张鲁要准备高考，彻底退出创作了。

形势的急剧变化使我们这个电影文学小沙龙很快解体了。张鲁在 1978 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考上了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离开广播电台读书去了。苑鲁也到一个师范学校的高师班读书去了。我在厂里被调出车间，担任了技工学校的语文教员。不久，得知重庆电视台开始组建，我向广播事业局送去个人资料（简历及一些电影剧本手稿），报名申请调去从事电视剧创作，获得批准并已通知我去电视台报道后，却临时被留在缺少人手的广播电台担任文史节目编辑，从此转向了另一条道路。

张鲁在校学习期间，我正忙于结婚安家、工作调动……和他没有联系，只是经常从王松生那里听到他的一些消息。后来从张鲁的同学、好友王康所写的回忆文章《来路与去向》中才较为清楚地了解到，张鲁在学校与王康等同学一起，掀起了一场建立学生自发组织文学社和民主竞选学生会的风潮。文革后的这一“民主运动”甚至惊动了公安机关，据说市公安局派员在西师驻守近月，详察与文学社和民主选举有关的人与事，结论是：并无反革命团体，“普通人文学社”属非法组织。有大量自由化思想，也有反动倾向，但属大学生过激思潮和受西方影响，没有理论体系，更没有政治纲领。据王康事后分析，这个相对温和的结论与当时专程从北京来西师与学生代表们对话的老干部张黎群有关。张黎群时任刚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四十多年前，他是成都抗日救亡学生运动的代表，1957 年在《中国青年报》险被打成右派，幸得胡耀邦保护过关，但文革中仍然难免挨整。由于他的经历，他虽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却不像那位在公开报告中居然把世界文学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等说成是“黄色小说”的重庆市委宣传部长那样对学生抱敌视的态度，而是对这些热血青年抱有“同情的理解”和保护的态度。

“并无反革命团体”的结论虽然没有导致直接的政治审查与迫害，但在当时形势下，仍由学院宣传部、系党总支出面，召开过几次“帮助会”（实为文革式的批判会）。当年文学社自编的刊物还在一农村社队小印刷厂排印校对过程中，即被全部没收，因此没有留下任何资料。王康凭记忆写下了张鲁在他们的“普通人文学社”成立时的一段发言，可见张鲁当时思想之一斑（图为在西南师范学



院读书时的张鲁)：

我们并非伟人、先知，更不是贵族。我们的文学社取名为“普通人”，这决不是我们自作多情，也不是纡尊屈贵，降格以求。不是，我们的目标是恢复普通人在文学中的地位！

请问，张志新是谁杀的？人们痛心、愤怒、追查！诗人作诗，作家立文。是谁？是“四人帮”？不错，是他们，但决不只是他们！还有我，还有大家！请问，如果当时张志新在你面前游街示众，你能保证自己不说“反革命，该杀！”

我常常痛苦地问自己：“四人帮”上了台，你会不会去游行欢呼？想来想去，我得到的回答是，我会去欢呼的。因为——那时，我根本没有独立思考过！

一个年长的朋友曾经问过我，别人的口水吐在你脸上，你怎么办？我琢磨了很久，说：“我自己揩干。”他却说：“不，让它阴干！”同学们，这就是我们过去的生活，这就是“四人帮”上台作乱得以通行的重要原因！

我们常说，官僚主义可恨，封建专制可恶，应该铲除，现在我要加上一句，先铲除自己身上的毒素吧！最可怕的敌人是你自己！

在那次民主竞选中，才华出众而又有个好出身的张鲁当选中文系学生会主席。

有论者指出，当年那场高校学生的竞选运动，“既是 1970 年代末民主墙和民刊运动的延续，也是 1980 年代学生民主运动的开端。它对于改革的强烈呼唤，直接影响到当时乃至此后十年中国政局的走向。由于它已经触及到宪政民主的一个核心领域——竞争性选举，对于今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喻希来《北京高校竞选运动》，载《往事》第 46 期，2006 年 11 月 8 日）

那届学生毕业时，凡参加了文学社活动和民主竞选的学生，都得写了检查过

关才能分配而且分配的地方或单位很差。好在张鲁是带薪读书的学生，学校不管他的分配。

广播事业局正是用人之际，没有让张鲁回广播电台编文艺节目，而是让他到了正处于筚路蓝缕时期的电视台电视剧部。那时的张鲁，经过在大学校园“民主运动”的洗礼，眼界更为开阔，思想更加深邃，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充满要大干一番事业的劲头。很快，他们那个青年摄制组就推出了一个接一个的新作，《山那边是海》、《巴桑和他的弟妹们》、《希波克拉底誓言》……迅速在电视圈里有了影响，并不断获奖。

(右图：张鲁刚到重庆电视台时。)

前程似锦的张鲁，这时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他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居然还开始学起了“西洋拳”，买了拳击手套，在城里的枇杷山公园里，和他的一位中学同学发起了学习拳击的活动，吸引了一批爱好者和好奇者。他那位同学在生意场上搏击风云，还在张鲁编创的电视剧中客串过黑社会打手之类角色，不知怎么后来竟真的成了重庆有名的黑老大……

我在广播电台先后从科教部文史节目编辑改调为广播艺术团编剧、文艺部广播剧编剧、文学节目编辑，张鲁来广播局（与广播电台在同一栋楼）办事时，我们常会碰到，但他都是来去匆匆，我们再也没有时间从容长谈。1987年春的一天，我又碰到他从广播局出来，我送他走出大门口，边走边聊了几句后，约定找个时间好好谈谈（我编写的一个广播剧已经在上一年获得全国奖，但兴趣仍然在写电影、电视剧本上）。

不料，两三天之后，一位与张鲁要好的录音员（也是他中学同学）告诉我：张鲁出车祸了！他在住家附近的公路上晨跑时被一辆汽车从背后撞上，虽幸免一死，却造成高位截瘫……我和他的几个同学（包括王松生）一起搭乘一辆小货车去医院看望了他。当时他还算镇静，仍然面露笑容与我们交谈。但命运已经让他



今后的生活道路彻底改变。

不久，我听说他被送到了北京求医，有人找到了他们一位女同学的丈夫、当时已经声名显赫的“大气功师”严新，据说严新正忙着给一些高干治病，先抽空从远处发功给张鲁，他失去知觉的双腿感到了热——能接收到“功”了……尽管我对此半信半疑（当时官方媒体报道严新发功曾使粉碎性骨折恢复原样，我也未敢相信），但还是希望在张鲁身上能有奇迹出现。这年秋，我与同学宋晓涛合写的一个电影剧本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看中，应邀去北影改稿，事先我已知道张鲁在 262 医院康复中心治疗，我与宋晓涛一起去看他。到了那里，向院子里几个坐着轮椅在下棋的病员打听，说他已经出院了。我们满怀希望问：“他好些了吗？”回答我们的是一句冷冷的话：“他怎么进来的还怎么出去。”

很难想象张鲁是如何从这样残酷的打击中挣脱出来的。从正处于人生与事业上升期的春风得意境地突然跌入绝望的低谷，谁能够从容面对？在这时候，也许任何亲人、朋友的安慰对他来说都是难以听进的空话。因为没有一个正常人能够体会到他的心理感受。在最沮丧的时候，张鲁曾连续两三个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困在轮椅上，甚至连屋外的院子也不去……

这时，除了人们都熟悉的保尔·柯察金，除了那个年代的青年偶像张海迪，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应该给了张鲁最直接、最真切的启示，这就是他的“松哥”王松生。因为王松生也曾遭遇了与他类似的命运打击——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健康青年骤然变成残疾人，而且比他整整早了二十年！那时王松生面前不但没有事业成功的荣誉，连事业的影子也看不到，更糟糕的是他因此在很长时间里不能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全靠父母的收入生活，当同学们都下乡当知青离开后，他更是陷入空前的孤寂……但他没有倒下，在那六平方米的小房间默默地坚持着学习和写作，自己摸索着写了一个个电影剧本，终于有一个剧本在 1984 年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从大量自然来稿里选出，请他去改稿并将改定稿在《电影创作》上发表了。此事在当年的重庆产生的影响，有一事可以说明：有关部门破例给他一个“特召”名额，在文化局下属的越剧团安排他担任编剧，他终于有了一个“饭碗”，随即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和孩子……

也许，这时张鲁还想到了他那些在文革武斗中被夺去生命、长眠在离他家不远的沙坪公园墓地里的同学们，那些同学比他更不幸，他们的人生道路还在“花

季”，还没有“走向生活”时就结束了，而且没有谁为他们的夭折负责，没有谁给他们赔偿、抚恤……

在一段时间里，儒雅谦和的王松生经常迈开安装着假肢的残腿艰难地转乘公交车去到张鲁郊外的家，去陪他下棋，和他谈心……终于，有一次王松生再去时，意外地在屋里没有看到张鲁，从护理员口中得知，张鲁自己转着轮椅高高兴兴上街去了……

轮椅上的张鲁终于从精神上站起来了。他又投入到电视剧的创作中，又继续获奖。以后，他又把目光投到了比自己更需要帮助的人群，把精力转到了扶助农村、山区贫困儿童入学上，在他的积极倡导下，重庆电视台和一些社会力量启动了“新世纪希望”电视行动，开办希望幼儿园、希望学校、希望书屋……1994年至1996年，他策划、导演了反映贫困山区儿童就学情况的53集长篇纪录片《跨世纪希望》，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正是在此期间，1994年，我所供职的《红岩春秋》杂志（我从1989年春调来参加创办了这个刊物）打算办一期增刊，专门以重庆文革大武斗为题材。我向张鲁约稿，他很快就写好寄来了，是用电脑打印的。这是他刚开始学习使用电脑的成果。我一看这篇《红卫兵武斗忏悔录》，就被他那生动的文笔和深沉的反思打动了，认定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稿。原稿实际上是两部分，前一部分写的是对他和他的同学参加1967年重庆大武斗的反思，后一部分写的是他们到彭水县下乡当知青后，1969年底参加当地一次武斗的情况。我建议他将稿子分割成两篇，他同意了。后一篇我给他起名为《六十年代最后一场武斗》。

我们的增刊结果没有出成（大约是没有申请到增刊号？记不清了），但张鲁的《红卫兵武斗忏悔录》仍然在杂志上发表了，是由我们杂志的另一位编辑、也是他同学的邹越滨设计的版式并选配了照片。

张鲁的后一篇《六十年代最后一场武斗》，我本来打算以后再用，但一时未能排上，他因手里没有留下原稿（电脑中的文件已经丢失），找我要回去了（后来我想，他索回原稿可能还有个不便明说的原因，即那篇稿子里写到的参加那场武斗的一些同学，后来都成了重庆一些政府部门的领导或企业主管，他在提到他们名字时虽然都用的化名，但仍然担心会



有人“对号入座”，还特地来信要求将化名再作修改，以免引起联想。也许是这方面的担心使他暂时不想发表此稿吧）。这篇稿子未能与读者见面，但我记得其中的内容，印象最深的有两处，一是知青们群集县城准备参加武斗，在县城大街上招摇过市，高唱着以电影《平原游击队》里日本鬼子松井的队伍出场时那几句脍炙人口的旋律编的进行曲：“知——青——的队、伍、来、了！钢、钢、钢、钢……”吓得当地人关门闭户四散奔逃；二是，他写到在全体知青都积极“备战”的时候，却有一位同学断然决定不参加武斗，独自返回重庆，头也不回地离开大家走了。张鲁从心底产生对这位“逃兵”的钦佩之情，认为：这才是最大的勇敢。

(上图：当知青时的张鲁。)

文中还有一处写到他哥哥（与他同学并同当知青）在那场武斗中受伤，虽然原稿不在了，但他给我的信中有对这一处的修改文字，刚好可以录上，以见其文之一斑：

我哥哥，性平和，与武打一行，本来隔得最远，但知青下乡后，中国平地生出一种新阶级，其成份在某一方面有如毛主席的书从前所划分的‘流氓无产者’，无家无业，无凭无据，无依无靠，唯有相依相靠，相依为命。我哥哥又最看重同校的这帮同学，所以大家亡命在外，他也不愿独自偏安一隅，就和大家祸福同路。
(武斗)全过程中，他手中那根锄把，真正是从未接触任何人的皮肉，蹊跷的是，偏偏是他受了伤……

张鲁的《红卫兵武斗忏悔录》，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是我认为对文革武斗反思最深刻、最动人、内涵最丰富、值得长期作为研究对象的一篇。后来我在《论造反派》文中和《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书中都引用了他这篇文章的内容。

张鲁所写的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位于重庆的中心区解放碑旁边，文革前就是市中心区的名牌学校，文革中该校学生建立了造反派组织“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是八一五派的中坚，后来两派分裂后，被反到底派骂作“战犯团”，分裂出

去的一派另外成立了“红一方面军”，他们办的一份以嬉笑怒骂的杂文见长、影响很大的小报《小人物》，则被八一五派骂作“小怪物”。在重庆市中心地带的武斗中，二十九中可谓“十处打锣九处在”，而且在八一五派控制的中心区，他们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的武斗队几乎就代行了治安警察的一些职能（他们治安巡逻队的武器装备竟比解放军的警备区巡逻队武器装备还好，在解放碑旁两队相遇时，那些与学生们年龄相仿的年轻士兵会向他们投来羡慕的目光）。派出所的警察后来都说：城里的小偷被抓到后，不怕送派出所，只怕送二十九中……

张鲁当时年纪尚小（15岁），属于未成年人，只是有限地参加了初期“冷兵器”阶段的小型武斗。但这场“史无前例”的、“人民杀人民”的“全面内战”，使他对生活，对社会，对人性，有了超越书本知识的全新认识，他看到了“书本之外的第一个英雄”，“书本之外的第一批俘虏”，“书本之外的第一批烈士”……都是书本之外的，身边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血淋淋的，而且许多就是他曾朝夕相处的同学，那些正值花季的青少年。他也看到一些同学在残酷的战火中发生的变化，领悟到“一枪在手，人是要变的”。他极不情愿地看到那些长期接受暴力革命教育的同学，在经历了武斗战火的血腥暴力“这一课”之后，竟变得会毫无人性地虐俘取乐，在侮辱、折磨女俘中得到派性的满足。他代替那些怀着“为毛主席而战”的信念死于武斗战火的同学发出沉痛的天问：“你们错在哪里？你们生不逢时？死得不值？生错了？死错了？……”每次读他此文（包括这次为写悼念文章而重读和将其转录为电子文本），总是像听到他动情的诉说与悲悯的呼唤，忍不住会热泪盈眶，感慨万端……

张鲁能从他并不丰富的武斗经历中得到那么深刻的感悟，我想，这与他因车祸而从死亡的边缘回来是有关的吧？因为他比常人更真切地体会了生与死的意义。当然，这也与他勤于学习，长于思考有关。再加上，他被命运逼到轮椅上之后，免除了一个“帅哥”在当代生活中可能遭遇的各种世俗诱惑与纷扰，这思考就有了更充裕的时间，更冷静的场合，更深入的对历史、对人生、对心灵、对上天的叩问。

说实话，我对张鲁那些电视剧并不看好，我觉得他太想通过电视剧去宣讲人生哲理，太偏重于抽象的思辨、说教了，也就是一般常说的“思想大于形象”。他想扭转电视剧这种供大众娱乐的通俗样式必须讲故事，必须编织戏剧冲突的方

向，等于是要用连环画来写散文诗或哲学论文。我曾给张鲁写过一封信谈了我读《红卫兵武斗忏悔录》后的想法，我说，我觉得他写散文比写电视剧更好，更得心应手，电视剧对他的束缚太大，他的许多思考，许多感悟无法在电视剧中得到表达，而写散文则可以充分发挥他这方面的长处。他回信说：“对我文字的评定，尤其是关于张鲁写散文和编电视剧的利弊分析，实在精到。我尽力尊重你的指点。”

然而，他毕竟身在“单位”，又是一个必须依赖单位给予照顾的人，他不可能自由写作。

他必须完成那些“五个一工程”之类的遵命作品。有一次，我看到他在电视中作巡回报告（我对这类报告向来不屑一顾），在与王松生说起时，我表示了不赞成他做这种事的态度，王松生宽厚地说：“他总得有所寄托吧。”简单一句话使我感到惭愧，张鲁毕竟是一个受到生活限制的人。我不应苛求于他。

（左图：王康与轮椅上的张鲁。）

在我认识的张鲁的朋友中，王松生是很能理解他、而且是在一旁默默地支持他的一个。王康则是张鲁的另一个精神相通的挚友。王康虽然在八九年后就被逐出了体制之外，在遭到数年通缉、亡命他乡后，回到重庆，成为时时受到有司关注、并不自由的“自由撰稿人”，“民间思想家”。但他从不把张鲁这样的体制内“红人”视为异己，因为他们相互间太了解了，仍然引为同道和知己。在王康的生日宴会上，张鲁发来的热情洋溢的手机短信贺辞被特地高声宣读……当然，官方的宣传中是不会提及这些的。

我相信，那些喧嚣一时的宣传终会像泡沫一样破灭。除了那些走出山乡的贫困学生——他们因张鲁的资助和鼓励从而有了改变命运的希望——会记住他之外，张鲁留在世上、会永远被后人记住的，就是这篇《红卫兵武斗忏悔录》，它将在对文革的反思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越来越体现出它的价值，成为研究文革武斗的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



在“人生耄耋已寻常”（李锐诗句）的今天，才 58 岁的张鲁离开人世实在是太早，他还有多少愿望没有实现，还有多少思考没有清理完善，还有多少文字没有写出来啊！

不过，他毕竟留下了这篇文章。

仅此一篇，即可无憾。

【文摘】

红卫兵武斗忏悔录

张 鲁

我家住重庆沙坪坝，离家两里，有沙坪公园，生机勃勃，是个游人喜爱的好去处，南有草坪，北有池塘，西有菊园，东有茶坊，熙熙攘攘，四面八方。

游人从不去的，是西北。

这一方，死气沉沉，不是个好去处。

这一方，住着我中学时好多同学。

我在这世上比我的同学多活了二十八年，我的同学在这一方黄土下比我多住了二十八年。

有句老话，道是：让过去的过去吧。说的是！过去的你还能不让它过去？可偏偏二十八年之后，有一种说法传开：为了另起时新的东西，推土机打算把我的同学从长眠的这一方黄土下生生地给翻出来。

想得到，白森森的骨头.黑洞洞的眼眶，我的同学望着上面这久违了的人世间，还是二十八年前本城夏天独有的红太阳，白太阳……

我于书本之外见到的第一个英雄

1967 年重庆的“七、八、九”三个月，在中国的内战史上，是该占有一章的，那时，我在市立二十九中上学，准确点说，是在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当红卫兵。

武斗初期，战斗团老是吃亏。

一日，“反到底”的“武斗之花”河运校“航锋”前来夜袭。战斗团一个战友外号少帅的，率领五个人守在一栋小楼上，被步步追杀，退到三楼阳台，再无半步可退，少帅就一人在楼梯口拼死抵挡，声嘶力地叫战友们把临时找到的一根救命索索拴在栏杆上缒下楼去，“快撤！”等到五个人都溜了下去，敌手已突破楼梯口冲上阳台，三面将少帅围定，工艺精良的钢钎直指少帅浑身上下十八处死穴，那意思很明白，逼少帅缴械投降，或者，就是想如猫捉到耗子之后那样，先要它个够，然后再一口咬死。换了别人，休想逃脱这两种下场，独独少帅，毕竟少帅，居然于万般无奈的绝境，做出不可思议的举动，一个后滚翻，上了阳台，立定一个大写的“人”字，发一声喊，跳将下去……

这一声喊，是：

毛主席万岁！

三层楼，外加阳台栏杆，要往水泥地上摔碎个把 18 岁的肉躯，是十拿九稳的，可是少帅活出来了.他的身体下坠到底层时，被钉在砖壁上的大批判专栏的遮雨檐“担”了一下，这一缓冲，他得以活到今天，活得甚好，市场经济中杀伐决断，是个很有魄力的厂长。

当晚我没在学校，后来去了，看见那遮雨檐垮了一大块在那儿吊着，其下，赫然有毛主席头像，木刻穿军装戴军帽高瞻远瞩洞察一切的那种.不晓得昨天半夜少帅那一喊，他老人家听进耳朵里没有？

又一日，我们准备夜袭从前是同学半年前是战友如今是敌人的本校“红一方面军”，摸黑溜出战斗团盘踞的造反大楼，沿墙根向同一校园内“红一方面军”盘踞的实验大楼急奔，少帅打头，路经他前些日子跳楼坠地的那一处墙角时，他站下等我奔至他跟前，压低嗓门命我：“你守在这里，等会儿我们撤退时，要是有追兵，你断后！拿着！”他把一根日光灯管和一包石灰塞到我手里，又埋头窜到队伍前面去了.独独留下我，刚满 15 岁的小伙子，刚够登记游泳证的小个头，和个头不相上下的小胆量，盯着左手那根 40 瓦的日光灯管和右手那包与油脂铺卖出的一斤包白糖差不多大的石灰包。说时迟那时快、十步开外已响起沙哑的厮杀声，是在实验大楼入口处大青石砌成的防御工事方向，从我所在的地方看去不大清楚，黑洞洞的只见晃动，不到一分钟便传来撤下来的脚步声，我哪里还有时间狠斗私字一闪念，赶紧靠墙根“埋伏”，一串黑影从我面前晃过，撤在最后的

是少帅，我侧目一看、其后并无追兵，我巴心不得！慌着混入小队一溜烟钻回造反大楼。

少帅是我于书本之外见到的第一个英雄，当他命我断后时，我面对面看见那伤疤和眼睛，是有如看见劫后归来的牛虻的。

接下来，我看见了书本之外的第一批俘虏。

我于书本之外见到的第一批俘虏

又一日，敌人大举进攻，主力是体委的大汉，头戴了坦克帽子身穿了坦克衣服持了丈八长的钢钎，攻不下造反大楼，便拿我校隔壁大同路小学的红小兵出气。战斗团当然分兵支援，我们守在大楼上的便投石呐喊。片刻功夫，一伙体委大汉冲进大同路小学，却不见先前对手，便猫了腰四处搜寻，像极地道战里鬼子进村，但我们却一些儿也笑不出来……从我们所在的视点，看得清全局，大同路小学的砖柱后，距最近的一个敌人最近不过三步，贴身躲着我们的一个同学，外号“大男人”，18岁，会篮球，身手麻利、模样英俊。他也真憋得住气，敌人过了砖柱竟毫无察觉，他却突然怪叫一声，挺枪刺出，敌人倒下，不见他的影子.跑得比球场上回防更快速。几分钟后，“大男人”钻回造反大楼.站到我们身边.袖手旁观大同路小学那边敌人抬那伤员，他喘着粗气，胀红了小白脸，对我说：“狗日的，钢钎戳进屁股里头，扑哧一声，肉叽叽的，好痛快！”

重庆八一五“烈士”在沙坪公墓下葬时，死人列成方阵，活人列成方阵；死人盖着红布，活人戴着黑纱；死人平躺，活人直立；死活之间，有第三种人，不死不活，要死要活；不红不黑，又红又黑：黑的是脸上被人抹的锅灰.红的是遍体伤口，又红又黑的是还在淌的已经干结的人血；非躺非立，全都剥光上身五花大绑跪在烧焦的土地上，自成一个方阵；这第三种人，不是人，是俘虏。

重庆“反到底”舰队从下游兵工厂溯江而上与盘踞市区的“八一五”决一雌雄发动“八八红港大血战”。十天后，舰队司令一声令下，就在担当旗舰的“人民”号登陆艇甲板上为血祭战旗枪毙了两个人。

不是人，是俘虏。

记得我是在“八一五”公布的罪行照片上看到这一甲板行刑的，说是“铁证

如山”。

但我后来明白.照片原是可以伪造的，“铁证”可如山，亦可如水。这里有一例著名公案——重庆造反派 1966 年 8 月 15 日在重庆大学揭竿而起的当年年底，12 月 4 日，“保皇党”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十万人集会，造反派冲击会场，据说牺牲五人，伤无数，噩耗传来，一时“白色恐怖”笼罩山城，这便是 35 岁以上的老重庆至今大都记得的“一二·四惨案”，在造反派的舆论攻势中.一首由女声长声吆吆一声吼开唱的挽歌从所有造反派控制的高音喇叭里唱出，撕心裂肺地响遍山城：

提笔写大字报想起了你，

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

那天我们一同去开会，

会场上我们却失去了你，

我们的好同志.....

会场上你呼口号最有力，

恶棍抓住你乱踢乱打啊，

你面对死亡不把头低！

(以下齐唱副歌)

你勇敢战斗！

你英勇无比！

谁知那一双黑手

把你青春夺去！

亲爱的战友.....

你永远活在我们

活在我们心里！

紧接着，“八一五”在战友倒下的地方，庄严推出烈士遗体大展览，一时成为惨案之后本城最大新闻。那天我和哥哥，还有邻居小耕一同去，排了长长的队，一个多小时才排拢，长队由大田湾体育场正门鱼贯而入，沿中场横线穿过绿茵早已褪尽的足球场，对直走向主席台，就在主席台下方，现在的足球运动员出场退场的那块空地上，设五张高高的灵床，陈五具尸体，煞费苦心将那“被拳脚棍棒暴打”的伤处暴露出来，至今记得最靠右边的一具，是个壮汉，本来厚实的胸脯因被暴打而更厚了一倍。有如驼背之鸡胸，当中一具，右眼珠流出，兀自与左眼一起圆鼓鼓怒瞪苍天，真正死不瞑目。当晚回来，去伙食团打了三两饭一份回锅肉，竟只能吃饭，不敢食肉。再看哥哥、小耕，无不如此。连日来，本城前往参观者，或不下百万，革命群众纷纷同情造反派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擦干净身上的血迹，一改口舌笔墨为脚尖拳头，以后更将脚尖拳头不失时机升级为棍棒藤帽，名正言顺吼出“红色恐怖统治山城！”

是夜，我听着“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之歌，在解放碑溜达。小耕眼尖，说：“张鲁，来看！”我凑到墙角，一张小字报，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唱着唯一的反调，是——

《天下怪事……人造烈士

试问周家喻，他（她）们都到哪里去了？》

大意是，“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十二月五日深夜，一伙形迹可疑的人突然出现在石桥铺火葬场，不奔别处，直接闯入停尸房。第二天工作人员清点发现，五具尸体不翼而飞！有人认出，这伙人为首的就是鼎鼎大名的重庆八一五头号人物周家喻，”小字报还提醒人们，时间正好是“一二·四”惨案的第二天，尸体正好是五具，文末署名“重庆工人纠察队地下尖兵敢死队”。

烈士可以人造，照片可以伪造；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可是文革杀俘，绝对是真！

杀俘者与被杀者，为同一个国家政权、同一个政治目标、同样的民族利益和同样的信仰而战。

这就叫“史无前例”。

我于书本之外见到的第一批烈士

又一日，刚刚进入 8 月，我从造反大楼出来，回家吃饭，碰见一伙同学正开了解放牌大卡车出发，一问，是去帮“财贸八一五”搬家，因其总部设在居民聚居的原财贸工人俱乐部，楼层低矮，射界狭窄，无从适应枪战新形势。我见姓欧的高中同学老练地跳上驾驶座，嘣地甩上车门，心头好是羡慕！那年月，三百六十行，工农兵当仁不让位居榜首，凡工与兵所能的，红卫兵无不以能其能为荣，至于农民，一直就是配盘的，很少有人发自内心去羡慕他们。车开出，我也走自己的路，从学校回家，正好走通一条中华路。经过“吴抄手”（本市名小吃，至今仍在那儿），有一小队人从我身边沿街边店铺墙根悄无声息溜过，青一色的不带领章帽徽的簇新军装（或者，劳保服？），猫着腰，抬头平视前方，一律右手提着闪蓝光的半自动步枪。两分钟后，前路半里地不到的地方，枪声响成一团，无比清脆，无比动听。两分钟后，那一小队人原路返回，依旧从我身边沿墙根溜过，依旧悄无声息，依旧那么快速。这时，前方，革命群众才开始乱嚷乱窜，起先是朝着我这一方乱跑，继而站下，又一窝蜂回过头去，朝着枪响过的地方涌去。见有热闹可瞧，我当然随大流赶上前去。

只见财贸工人俱乐部门口街边上，一辆解放牌歪斜倒地，车厢上下，几个学生模样的人横七竖八俯着仰着，大家都隔街自觉地画一半圆袖手旁观（这一古老传统至今留存），我也混迹其中，突然一个念头令我违反公众的惯例挤出人丛横穿小街直奔卡车跟前去……我想起了十分钟前打过招呼的同学！

驾驶座一侧的门开着，驾驶员双腿还卡在车内，上身却倒吊着仰在车外，后颈窝正好枕在上车的踏板上，男孩子 18 岁刚刚开始发育的喉包因此显得格外突出，颈子上比一分钱硬币还小的一个洞，像今天的娃娃们吹泡泡糖般吹出泡泡来，是血泡，吹到极大，就爆了，紧接着又吹下一个。倒挂着的脸上，那双本来就又圆又大的眼睛因倒挂显得更圆更大，极圆极大，正从我膝盖以下的位置对对直直仰视着我正视着我逼视着我……是姓欧的高中同学。

他叫欧家荣，是后来，我从讣告上知道的。

后来，多了点常识，我还知道了，他当时还没有断气。

后来，我更从油印的《敌情通报》上知道，那队一言不发连大气都不喘一口

专用自动步枪说话的人，是某厂工人，都是从部队上转业下来的“……据内部情报他们是事先潜伏在‘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内，当天下午5时许荷枪实弹偷窜出来的……”读到这里，我倒抽一口冷气……就是那天十分钟前从我身边溜过来五分钟前从我眼皮底下溜过去的那一队！

余自强，男，重庆二十九中初三一组学生，班长（班委？），因为是我哥哥张泓的同班好友，我也对他相当熟悉，个头不矮，国字脸，浓眉大眼，面色红润，刚刚长出男性性征的唇须和喉包，终年17岁。

唐明渝，女，重庆二十九中初二学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主要演员。生前，是同学尤其是男同学注目的中心；死后，清早贴上墙的六位同时死难同学的讣告过夜常常只剩下五张，她的像片，总是被登徒子们撕了去。唐明渝要活到今天，正是那些拍摄《十六岁花季》之类电影电视的导演一进学校就会盯住不放的女主角候选人，而她正死于十六岁花季。

崔佩芬，女，初一学生。当场没死被送到重医附二院（文革中，是“八一五”在市区的专用医院）抢救。我的另一位同学，因别的事受伤后也住进那里，医生护士摆谈中不止一次说到，“你们二十九中那个女娃娃！得了！”说是手术台上，主刀医生确认抢救无效女病人已经死亡，望着那张还太年轻的面孔和那具还太年轻的身躯叹一口气说：“没得脉搏了。”崔佩芬居然睁开眼来说：“医生！还有！不信你摸嘛！”医生吓一跳，接着心脏按摩。又过了一阵，医生再次确认女病人已经死亡，主刀医生和同僚们对视一眼后壮着胆子又说了一句：“心跳真的没得了！”居然崔佩芬又睁开眼说：“还有！”

李元秀，女，二十九中初一学生，终年15岁。

杨武惠，女，二十九中初一学生，终年14岁。

1967年7、8、9三个月，百日之内，我失去了六个同学（岂止！另一派的同学也付出了同等代价）。我校在市中学中，排在第二十九，我市有序号的中学何止一百？更有没序号的，更有大学，甚至小学，更有工农商，更有解放军，更有老弱妇孺……

重庆武斗高潮中文斗仅存的“唯一景点”

“东方红广播站”在东方红电影院（今国泰电影院）楼上，对面正是“完蛋就完蛋广播站”（今交电公司大楼），重庆两大派最大的两大喉舌在重庆最闹热的解放碑地区隔街对峙，重庆最著名的说书人和“油嘴子”就在高音喇叭里展开对攻。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口号，说是出自有着特殊身份的“旗手”江青之口，叫“文攻武卫”。其实，那几个月的中国，所有的两大派都在台面上高举着这一旗号，而背后所干的都恰恰相反，是文卫武攻。本城的爷爷婆婆们往往端了茶杯提了烟杆于饭后闲时去那两栋大楼底下的街边坐地而听，因为这里有时事新闻可听（当年的国际时事除了越南就是阿尔巴尼亚，而国内新闻除了全面爆发的内战还有什么能引起人们注意的呢？），其后又有专业水平的漫骂令人捧腹，当真是消夏的好去处。漫骂到了后来便指了对方的生理缺陷来攻击，没有值得一提的生理缺陷，就给你派生一个。终于说到姐儿妹儿的荤话。

这一处实在是重庆武斗高潮中“文斗”仅存的唯一景点。

生死之间的最后一喊变味了

武斗中，胡传葵叉起腰杆的那一声唱“有枪就是草头王”成了英雄们的信条。一枪在手，人是要变的。

7、8、9三个月，八一五的伤员集中在重医附二院；反到底的则集中在重医附一院，一栋大楼虎踞当中，周围平坦低洼，能见度极好，半自动步枪射程以内毫无遮挡难攻易守，正适于伤员救治疗养。八一五视作眼中钉肉中刺，日日在对面高地上的三机校架了三七口径的高射机枪朝大楼平射却收效甚微，只供了大楼里的伤病员治疗之余作对射游戏之用。此地又正好占据了市区通西郊的交通要道，八一五军车屡屡受挫，便煞费苦心制订全新的作战计划。不知是哪一位参谋人员竟天才地想到了抗美援朝战争史上邱少云为之牺牲的那一次著名战例。

于是一天夜里，一支和邱少云他们当年一样装备精良一样视死如归的志愿小分队从我方高地借着夜色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敌方大楼之下的那片低洼地。据对敌情多日观察，已掌握其基本活动规律：一天二十四小时守卫森严，夜里尤甚，唯独晚饭后，见白天一天无事，伤员和守备人员便会放松一阵。高音喇叭这时也会唱起“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要不就是“这个女人不寻常”。唯有

这一刻，重医附一院才像个医院。夏天重庆的烈日，青纱帐里的蚊叮虫咬……总之，当年那支志愿军小分队忍受过的一切，这支小分队也都忍受过了。这其间，同样也有敌人从大楼中出来，像那几个戴钢盔的美国大兵一样朝他们潜伏的地方骚扰射击，但都同样被我方的火力打得很快缩回了乌龟壳里去。不同的只是敌方没有打出燃烧弹来，没有烧着这片低洼地，也就没有再产生出邱少云来。

小分队终于熬到了黄昏那唯一的机会，突如其来冲进大楼，突袭成功，连结局都和当年那次战例雷同，所不同的是下面这件事。

冲进大楼上了楼梯之后，人们便沿长长的走廊挺进，分头歼灭各个房间的敌人。有一人，大约战斗片看得不少，且内心深处早已进入角色，活了十八年终于活到这一天，电影中事居然在眼前发生，更兼在洼地里苦苦熬了一天，其心情激动不难想知，于是便大圆其英雄梦，效仿电影中战术动作，正对了紧闭的房门站定，高抬起穿了大头劳保皮鞋的右脚，一脚踹去，平端了冲锋枪正要一通横扫，殊不知，死守要塞的本来就是敌方精锐，哪个没有几次打仗杀人的经验教训？房门开处，早有数发子弹从不同角落一齐射来，当先踹门的这条好汉一个后仰连连翻滚倒在楼梯口。血的教训，后续部队谁还敢玩派头？全都猫着腰蹑手蹑脚溜到余下的紧闭房门贴墙躲好，从屁股后头摸出手榴弹从门上方小方格玻璃窗手一挽像美国职业男篮明星贾巴尔那样投将出去，待得一声巨响后乃敢数人交换眼色一齐冲进，平端了冲锋枪组成交叉火力绞杀那屋里残存的生命。

速战速决。撤离大楼时人们才发现那位先驱者竟从三楼顺楼梯滚到了一楼，正挣扎起来，双手捂紧男性之根本特征的那一处所在，扶墙站定一个蜷曲的“人”字，发一声喊，咽了他 18 岁的最后一口气。

这一声喊，是：

哥哥们还没有尝过人肉味哟！

这一声喊距少帅那一声喊，不出三个月。百日之内，两个同龄人同出自生死之间的最后一喊，变味了。

一枪在手，人是要变的

三个月后，我和战斗团的大多数同学回到校园，礼堂垮了半边，后门缺了一

角。唯一完整的建筑是造反大楼的工事。以往上课时可以开小差歪了头眺望解放碑的我的初三·四组的教室窗口，如今成了射程能够控制这一带大街的碉堡枪眼，千疮百孔，断墙残壁，正应了那两句著名的诗——“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真正变了的是人，带枪的人。

我到教室——碉堡内部去找当年的同学战友，摸过黑洞洞的走廊，一推门，眼前一个白森森的东西一下子荡了开去，还没容我反应过来，又荡了回来，砰的一声，正好和我接一热吻。我本能捂住被亲得发红的嘴巴定睛看去，和我亲嘴的那个人那张嘴，人倒是人，嘴也是嘴，只是有人无气，有嘴无唇，却是个骷髅头！

惊魂未定，突然爆发一阵大笑，一时间我竟以为是这个呲牙咧嘴的骷髅口中冒出。幸好不是——对面炕上，抱枪而坐，枕刀而卧，一堆人笑得前仰后合，正是我的同学，三月不见，恍若隔年；三月不见，尽都学到了抽烟；三月不见，16岁的脸上全都长了胡子；三月不见，16岁的脸上全都长了横肉；三月不见，对我笑起来一如当年，只是那笑于亲切友好中更多了一点什么。细细一品，是自豪和优越，是我保护了你我冒着枪林弹雨为你谋了利益的自豪感和优越感，就好像八路军武工队看到高家庄民兵和老百姓时的那种笑。炕，是用教室课桌拼成，上面堆满了文革之初没用完反正也再也用不上的写大字报的毛边纸，铺也是它，盖也是它，半夜有情况一翻身拖了枪塞进枪孔朝外射击时，垫的也是它，屎胀了，顺手撕了一角去揩屁股的还是它……

武器在手，文具只好另谋生路。

坐定，点燃平生第一支烟，再看那骷髅，是用刺刀在天灵盖上捅开一个窟窿，栓了绳子，挂在门背后的。不知者一推门，当然要先荡开去再扑回来找你亲嘴的。一问，是从生物教研室偷来的。于是我便油然想起当年上课时扁嘴的生物老师捧出它来往桌上一放时在少年人中引起的那一场轩然大波。如今，少年依旧少年，骷髅依旧骷髅，只不过历经了这么三个月，对死的恐惧竟自成了对死的儿戏……

正坐，外面喧闹声起，一个初一的同学押进一个彪形大汉来，是街上的群众扭送来的。那年头，彻底砸烂公、检、法，二十九中地处闹市，毛泽东主义战斗团那股学生时代的纯正之气又还没有丧失殆尽，所以解放碑一带革命群众但凡抓了摸包贼没地方送就往往朝我们学校送。这汉子便是其中之一。那位初一某同学外号叫“帝修反”，简称“帝修”。

只见“帝修”办案自也与众不同，既不问姓名年龄，也不审作案经过，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开场白也全免了，一上来就问：“哪只手摸的！”

“右手！”汉子居然也答得干脆。

汉子便将右手放在桌上。与此同时，我见“帝修”将自己的右手悄悄收回身后臀部位置，唰一声抽出一把匕首全然不动声色地戳将下去。汉子也真不愧为贼中高手，当真手快，早已本能缩回，匕首硬生生戳进课桌，震得“帝修”右手发麻，当下恼羞成怒，切齿骂出：“狗日的敢躲！”这边司空见惯正闲扯的人们便也闻声围了上去，有的手头便顺势提了刀枪。汉子便收了先前“甩钢条”的气势，软了下来，连连分辩：“不敢躲！不敢躲！”“帝修”喝问：“那你龟儿子把手缩回去做啥子！唔？”汉子怕兮兮把手摆回桌上，“帝修”再次把刀举起，汉子紧闭双眼，“帝修”却于中途猛地收刀，又从鼻子中“唔”出一声来。我等都不明其意，汉子也睁开眼来，作不明其意状，“帝修”却冷笑道：“格老子还变得快耶！”汉子便苦笑。我们这才看出，汉子这一回摆在桌上的竟是左手。

“帝修”：“啷个说？”

汉子：“我是左拐拐，真的，不信你看嘛，抽烟都是用的左手，你看嘛。”

我们看去，果然，其左手食指中指黄透焦透，殃及五指，活像腌猪蹄。再看右手，居然洁白如玉，连指甲都修得来整整齐齐，宛若女人手。活了十多二十年，这两种手，也算见过，但一左一右，合二为一，组成同一双手，尚属首见，于是众皆称奇。“帝修”喔一声：“喔，是左拐拐？”

汉子应一声：“真的……”

话音未落，一声惨叫，“帝修”攻其不备，早已手起刀落，汉子便抱着左手满地打滚，吼得来杀猪一般。“帝修”却冷冷道：“吼完没得？吼完没得？吼完了把右手给老子摆上来。”

汉子抬起头来，眼巴巴望着“帝修”，那目光有如待屠的牛。

汉子和“帝修”较量，前后不过几分钟，却由开始的“甩钢条”，到后来的哀告讨饶，此时更引颈就戮，坐以待毙，他到底明白了面前这群学生娃自从经过三个月的战火之后就不再只是学生娃了。而缺了这一课的我却看不下去了，我说：“帝修……”他说：“张鲁你莫照闲。”我只好闭嘴，眼看着那只女人般的玉手摆在了桌上先前左手所摆的位置。“帝修”慢慢抽出刀，悠悠地：“你社会上的那些

抖摆要到老子们名下来了！（转对我说）你晓得他为啥子舍了左手非要保右手？
(转对那汉子) 你各人说呀？怕说得？（转对我）他还要留到这只手好再摸包！
(转对汉子) 对不对？”

眼看汉子今天这双手是保不住的了，这时外面响起《骑兵进行曲》。众人迅速交换一下眼色，竟似视这流行乐曲如压倒一切的命令似的，“帝修”照汉子屁股上一脚当下打发了他。汉子刚出门，这边已经纷纷提了枪整装待发，一边告诉我，这《骑兵进行曲》当真是战斗团 102 部队（武斗专业队）的集合命令。我也就跟在后头去看闹热。却是有革命群众来报告，有社会上的人为争地盘事在较场口米亭子背街处一家茶馆里吃“讲茶”，说是“身上都带了东西的”。我们赶到，“讲茶”早已不再过讲而升级为械斗。

渝州府自古就是江湖。打抗战的时间，又立陪都。文革武斗，解放十八年来被镇压下去的许许多多重又冒头，当时称为“社会上”，数十年后的今天，称为“黑社会”。

带枪的学生一赶到，威猛刚强的“社会上”的人居然当下收手，全被押解回了我们学校。

依旧是“帝修”式的办案程序，也不审也不问，就说，你们不是喜欢打么？就打嘛。于是命那两拨人就在大操场扯开架势打。哪还敢打？就说，不打？老子们好久没打了，今天倒要看下子你们是咋样一个打法的，也算过个瘾。那帮人还是不敢打。就又说，好嘛，不打群架，那就单练。就将两拨人一边喊出一个来，发了刀刀棒棒，单练。还是不敢。就喊其一趴下，令另一举棒打去。这一位不敢打重了，看起没劲。学生中就有一人悠悠从观战者一群中走出，伸出两指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从此人手中要过棒棒，拉开过去衙门打板子的架势照趴着那位一顿痛打，打毕，把棒棒交回站着的人手上，伸出两指推推鼻梁上的眼镜，悠悠回到观战者一群，活像体育课被老师叫出队列投了一回篮又回到队列。就问那人，这下学会没有？那人连连应声，会了会了，举起棒棒要打。但有人说，打学会了，该学挨了。于是就换了趴着的那位起来，命这位趴下。趴着的那位自然将这顿痛打的怨气全发泄在这位身上，棒棒舞得比眼镜更圆。于是这两拨人一对一打了又挨挨了又打，直把个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大操场打得来僻僻啪啪妈啊娘的响声连天。这还不算，又有人想出点余兴来，叫这两拨人“大联合”合二为一列成方阵

表演当时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流行歌舞《车水忙》，直到此时我才觉得这伙五大三粗的汉子真正可怜，他们五大三粗五音不全身穿棒伤，还要学女学生妹声妹气扭腰摆臀载歌载舞：

“车水忙，车水忙，脚踏水车喜洋洋，水过清渠哗啦啦响……”

现如今，公安机关如何管教“黑社会”不晓得，我反正晓得武斗之后有了二十九中战斗团在，解放碑一带“社会上”的或多或少总有些收敛。

接下来，解放碑一带“社会上”又多了几位名头响亮的人物，正出自我们二十九中战斗团。

八百年渝州，自古江湖，今又江湖。

一枪在手，百日之内，我们变了。

18岁女子

又一日，校园《骑兵进行曲》再起。这一回，是隔壁大同路小学“小闯将”有人来报，说是“102”部队有一人外号叫“漏症”的被不明身份的三个带刀的擒了去。这还了得！“102”当下出发，从上回体委大汉进攻的墙洞钻过隔壁大同路小学去，由早已空无一人的教学楼一路搜寻上去，听得二楼尽头一间大门紧闭的教室里有人声传出，破门而入，正见那三人和“漏症”，“漏症”却全无被擒之迹象，正高高坐在垒起的课桌上，双脚悬空兴奋地来回晃荡，嘴因全神贯注而大张，露出因之得名的漏风的缺门牙。我们循着那视线望去，教室那头积灰寸厚的地板上，趴着一名女子，穿的军衣军裤，军用皮带已解除，那三人正有一人用双手按住她的双肩令其不能动弹，另一人坐在她双腿上正要扒开她的裤子，还有一人刚抽出三八大盖刺刀连刀带鞘作了刑具就要对她进行抽打刑讯，见我们破门而入，连忙收手，换了张脸，义正辞严喝问，要女子交待：“枪，藏到哪里去了？”

我们一进去，先将此三人缴了械，带到另一教室问话，腾出这边也好让那女子起来。一问，这三人却说自己是河对门哪个民办中学“八一五”的，就不好说了，对他自然客气了些。又说这女子是学校反到底派武斗女干将，那几个月里杀得他们好惨，后来畏罪带枪潜逃，正八方通缉没想到在会仙桥一路车站被他们撞着，这一来众人便将先前好一股英雄救美女的豪侠之气当下打消。这个世界上绝

没有超阶级的人性，这在当年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便叫了那女子过来，一问，果然。但却道出一段要紧的后话：在 9 月底最后那一场水塔(或某大楼某高地，记不真切了，但好像是说的水塔)争夺战中，眼见和自己最好的那个男生当场被一串子弹打得来肠子流了一地，倒在她怀里气绝身亡，她便将一切都看淡了，决心退出一切人世纷争，把枪丢在地上她转身就走了。殊不知这一来竟搞得本派的把她当成临阵脱逃要抓了回去开设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对立派的又把她当成女杀手也要抓了回去公审，为他们的死难者抵命。女子走投无路，打算到朝天门赶船跑到涪陵乡下远房亲戚那里去避避风头。没想到刚刚车过会仙桥，冤家路窄，撞到他们。如今明知不论落在哪家手头都是受尽屈辱到头来还难逃一死，不如就请各位哥哥们今天此地就高抬贵手，一枪或一刀帮忙结果了她，自己到底是个女娃儿，再往下的事实在受不了了……

说话间，数次被那三人喝断，女子便低头不语，又欲罢不能，便抬起眼皮朝我们这边望，见我们这边全都陷入沉默，女子便壮起胆子又说，双方都显得如此真诚，一时难辨孰是孰非孰真孰假，但扪心自问，大都情愿相信女子所言是真。本来案子办都办到二十九中衙门里来了，以我等的权威，要判她个当庭无罪释放那三个怕也只有无条件服从绝不敢上诉的。只是此时冒出一样东西，使得原本朝着女子那边倾斜的天平开始急剧反向——是派性，那十年至高无上，那三个月之后更上升为绝对真理的派性，决定了女子终审裁决的大不幸。

二十九中正派，不对女人采取解衣解裤的“逼、供、信”。但二十九中正派，对敌人却绝不软手，于是便叫小闯将找了墨和剪刀来，墨现成，抹了女子一脸；剪刀就难了，好不容易找到一把过去上手工课用的，早已锈得不堪，也不管这许多，按定女的头就开绞，生拉活扯剪了个阴阳头，那头发，一半是剪下来的，一半是扯下来的……

女子年方 18。后来我看到过一个多有名气的世界级作家书中写道：“我从不形容 18 岁的女孩子，因为这样做是一种亵渎，任谁的一枝笔都不可能和万能的造物主相比！”他都把话说尽了，我这里自然也该学聪明点。我只想说，那女子，18 岁女子应有的她已尽有，而且，就有一百个同龄女子列成方阵站在你面前，你也不可能随意把她忽略。父精母血天地化育的 18 年竟毁于一枝秃笔一把锈剪三五分钟和十多双男人的手。她一开始还哀告，哀告无效则继之以呻吟，呻吟也

不能换来同情，便只有无声的恸哭，泪水在新上脸的墨迹上洗刷出一道又一道雪白……非要还 18 岁的脸以本来面目……

张鲁当时也许随着起哄冲那女子乱嚷嚷了许多，但今日行笔至此却只有一句话想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 18 岁女子说……

女人啊，不到你的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你千万要远离战争！

他再也没有回来
他们再也不能回来

“八三、八四、八二二”，这是那年 8 月战斗团与死神接吻的黑色的三天。当年枪战中，几乎所有的武斗队都将毛泽东七律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生生抽出写在了自家的战旗上，唯有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是在人人心中铭刻上这七字一句的数码。

八位同学就死难于这三天里。

八位同学中，张光耀是最先死的。有老同学说。

张光耀，重庆二十九中学高三·三组学生，男，194(?)年(?)月(?)日生，1967 年 8 月 3 日死，享年二十(?)岁。

文革开始时，我们战斗团是以文斗出名的。战斗团的勤务员(当年对负责人的称呼，以示“共产党人不是作官，是作人民的勤务员”之意)张光耀，写得一手好字，更练出了一手油印的绝活，有一回到大众游艺园门口摆开油印机当着广大革命群众表演，一张腊纸一口气印了三千多张传单，印了就交小同学当场散发(我也算其中之一)，这个纪录，后来的专职打字员是否突破过，不得而知。但我想，换在今天，张光耀当与吉尼斯有缘。

“他是打起甩手(俗语，含赤手空拳、轻松地甩动双手义)走的。红一方面军占了大操场后面的警报塔，‘石油兵团’(石油校八一五)的几个学生跑去摸哨，遭发现了，塔上打下枪来，受了重伤，人就摆在那里，石油校的几个女娃娃跑到战斗团来找援助，守在造反大楼里头哭，就在原先的教师休息室那里，还记得不？女娃娃有个啥子办法嘛？还不是抱成一团哭！张光耀听到了，又没想啥，说了声，去把人弄回来，车身就走，我在那里看到他走的，还是甩起手走的，活像……”

老同学说着撑起身来拖着武斗后安的假腿，学张光耀甩着双手去救战友的轻松模样。

“活像到大操场去捡个篮球转来一样。”另一老同学说。

“真的是！”老同学说。

“结果去了就没转得来。”我说。

“那不是？”

于是大家就笑，就摇头，就喝酒……

孙渝楼，重庆二十九中高中学生，男，194(?)年(?)月(?)日生，1967年8月22日死，享年18岁。

这一年夏天，日头特别毒，老重庆说，百年不遇。8月的那天下午，我去朝天门，过街时，凉鞋都被晒化的柏油粘掉了后跟。柏油粘不住的是坦克。坦克履带，是钢铁铸成。

这一年夏天，人民启动了军用坦克、武装了民用轮船，担任旗舰的那艘，就叫“人民”号。人民动用了除飞机核弹以外的一切常规武器与人民展开全面战争。

一颗天灵盖中了舰用三七炮弹的人头在朝天门码头的回水沱中，头颅里已经什么内容也没有了。只有长长的头发，像水草，在水中漂来漂去，竟真的招惹来小鱼小虾在其间游进游出地嬉戏。吓得我赶紧缩回脚，那两天再也不敢下河洗澡。

公元1967年7、8、9三个月，每一个白天，每一个黑夜，九十个日日夜夜，都有中国青年杀中国青年；中国人杀中国人；人杀人。

8月22日那天夜晚，战争双方如狂犬般相互撕咬。反到底突然袭击八一五控制的南岸上新街的南岸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枪声一片，杀声一片，哭声喊声一片，困守者措手不及，随时都有人中弹身亡，随时都有人临阵脱逃。重庆中学生红卫兵红联会驻南岸区革筹组特派员孙渝楼，为掩护群众和战友安全撤退，只身断后……

生前的孙渝楼我是否见过，没多少印象，可是他死后的那一张遗像，我今生难忘。后来我看过多部演烈士的电影电视剧，我相信我的那些导演演员和搞人物造型的美工师化妆师同行们，要是见到这张遗像后，肯定会换一种拍法。冷峻，凛然，苍茫，孤傲……

“……他喊我们先走，个人留在最后头，我只听到一阵阵的打枪，打一回枪，

我前后左右就少几个人，我从窗口跳下楼赶紧回头喊他，最后一眼还看到孙渝楼的半截背影在二楼窗口，那阵反到底的肯定逼上楼逼得很近了，孙渝楼连回头应一声的空子都没有了，更莫法跨上窗口往下跳。又一阵枪响，这一回响得比前头哪回都急比前头哪回都密，我再回头，窗口就再也没得他的人了。一没见他，窗口上马上堵满了人，黑漆漆不见脸，尽都拿枪朝我们这边扫，现在想起，不是孙渝楼，我只怕那阵都完蛋了，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

“完蛋就完蛋”是林彪在解放前打反动派时说的，“文革”武斗中这一林副主席语录被敌对双方广为引用，随着战争升级引用频率越来越高。

几小时后，有一人来我校报信，捶胸顿足，神态恍惚，带血带泪，语无伦次，说了上面一段话。

二十几年来，有人说起这事，我脑海里便涌起一组难以磨灭的形象记忆：

……一个青年学生，用单薄的身体挡住二楼的窗口挡住枪口，为他人留出一条活路……

……一个青年学生，听不得女生的哭告，甩起手就走，去救枪口下的同学结果却没有转来……

倒回去二十年，他不就是陈然、邱少云、黄继光？

倒回去五十年，他不就是秋瑾、林觉民、谭嗣同？

倒回去千百年，他不就是田横荆轲文天祥？

杀身成仁，舍身救人，以身殉国，舍生取义……

本民族一脉相传的精神基因，他们都如此忠实地继承了，可他们却只能是孙渝楼，只能是张光耀，只能是余志强，只能是欧家荣，只能是崔佩芬、唐明渝，只能是……

你们只能是你们啊！我和我儿时的同学、战友，长大成人后每逢清明忌辰；每逢八三、八四、八二二；每逢听说连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后借以掩盖身体的那一抔黄土都要被推土机推平了，另起今人喜欢的物件；每逢阿富汗、索马里、格鲁吉亚、萨拉热窝成为电视热点时，总会有摆脱不了的回忆、警醒和惊惧……

你们错在哪里？

你们生不逢时？死得不值？生错了？死错了？

你们才刚刚 16 岁 18 岁 20 岁啊……

我们却活着。
活着，就没法忘记。
活着，就不能忘记。
活着，就不忍忘记！
活着，就不敢忘记……
提笔写这篇文稿想起了你，亲爱的同学你在哪里……
谨以这篇文字捧作一杯酒，三炷香，祭奠于我的死于武斗的各位同学，祭奠于我的死于武斗的千万同胞。

原载重庆《红岩春秋》杂志 1995 年第一期。本刊这次转载时对个别明显差错略作了校订。

【文摘】

已经消失的中国“犹太人群体”

林 达

这是我在 6 年前对文革的一点清理。写作冲动源于一部文革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当时影片引发网上激烈争论，我感觉不论争论哪一方，都没有道出我自己隐约的一些想法，我一直习惯在书写中清理自己，也就顺手写了这篇文章。写完，也就扔在那里。很快 6 年过去，一些偶然事情让我重新找出这篇旧文，也有了给更多人看看的想法。我发现这些想法其实是有关文革的独立议题，与那部电影已经没有太大关系。我做一些修改，也把自己想让旧文面世的原因写出来。

一，反省红色教育的前提

文革，是我们经历过的二十世纪中国最重大事件之一，漫漫历时十年。正因为历时弥久，占据了经历者生命中的一大段，文革永远改变了他们的精神历程和

生活轨迹。不仅如此，虽然文革相对漫长的中国历史只是一小段，但它无疑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这是许多历史学家和普通人，都有冲动要去审视和反顾它的原因，也是亲历者会不由自主关注文革研究的原因。

“八、九点钟的太阳”，这是毛泽东形容年青人的一句话，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探讨重点是那一代年轻人被革命教育愚弄直到觉醒的经历，是检讨革命教育（包括所谓“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影响力）的一个尝试。就专题片来说，也在尽力涵盖诠释文革前的中国红色宣传教育、中国高层矛盾来源和十年文革始末的重大事件。

这样一部小制作文献片，引出了极为对立的激烈争论，也从一个侧面传达了文革研究现状：一是研究少、文献片堪称稀有，在发生地中国，文革还是禁区，文字可私下做，出版略为松动，就挤出一些在官方言论界限内的出版物。影片就不同，不仅需要资金，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根本没有上映的可能。所以，一旦出来一个，就会引起各方强烈关注。文革文献片的分量，少得与如此重大一段历史完全不相称；二是中国对文革研究和公布真相的禁锢，带来长期认识分裂，对文革及其领导者，远不像德国对犹太人浩劫及其责任者那样，有相当一致的主流价值判断。

在中国和国际间都是如此，迄今为止，中国学界不乏全部或局部肯定文革的大量学者；文革领导者在中国，仍然是官方推崇民间追捧的英雄伟人；在西方，毛泽东远非希特勒那样的政治敏感人物，2009 年奥巴马夫人主持装饰的美国第一圣诞树上，一个圣诞装饰球的贴饰中，有一块小小的波普艺术家画的毛泽东像，引起争议。我想，假如换作希特勒，哪怕是波普艺术，白宫一定会小心避开，免得触发敏感议题；同年，美国前白宫新闻官在公开演说中声称毛泽东是对她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假如切换到犹太人浩劫的责任者希特勒，这样情况绝不可能在德国、美国或者任何西方国家发生。

所以，对红色教育的反省，其实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首先明确文革浩劫毁灭性的灾难后果。这和反省纳粹教育的道理是一样的，德国人认为，假如持续纳粹教育，可能产生新一代纳粹青年、可能导致浩劫重演，而浩劫的灾难性是清楚的；那么，反省红色教育，也应该是为了避免产生新一代红卫兵，避免再次推出文革。可是，文革究竟是什么，相比犹太人浩劫，在国内国际间，都还是模糊得

多的概念。

也就是说，文革爆发迄今已经 40 多年，却至今没有强有力的文革叙述，推出被基本一致接受的结论来。

二，中国是否存在“犹太人群体”

一个原因，是文革的复杂性遮蔽了它的本质。在文革研究中，有很多人认为，文革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其复杂性远远超过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的经历。在犹太人浩劫中，迫害者与被迫害者的界限非常清楚，而文革的迫害关系复杂。尤其是文革中有大批中共干部和追随者受到迫害，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文革之前也曾经参与迫害他人；在文革中，更普遍存在迫害和被迫害的多次循环，迫害者和被迫害者之间，似乎并没有一条清楚界线。因此，反省文革，假如简单以德国犹太人控诉浩劫的方式，很难达到深刻反思的目的。

这是对文革相当普遍的一个看法。我感觉，人们更多关注了文革表层的复杂，却忽略了两场浩劫的共同本质，在文革反省中，德、中两场浩劫非常一致的地方，没有被提出和强调，那就是：中国事实上也存在一个“犹太人群体”，它是文革迫害模式的核心。

文革红色恐怖压倒一切。恐怖的最基本对象，就是中国的一个“犹太人群体”，这个群体从 1949 年开始被大规模“专政”，被非法杀戮、被无罪监禁、被非法限制自由（管制）、被非法剥夺财产。他们是所谓“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含前国民党政权的军政人员，所谓历史反革命）、坏分子。他们的“纳粹时期”，从 1949 年就开始了。而在“解放区”，即 1949 年前的共产党占领区，主要是随着土改推行，远早于 1949 年就形成专政雏形。

根据 1954 年宪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全国有两千多万人、富、反、坏分子失去公民权。

（引自 2004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这两千多万人，与 1949 年之后的迫害循环无关。从来没有出现过让他们起来迫害别人的一点点可能。在文革之前，最高法院院长就公开宣称：“在依靠群众实行专政这一根本路线的指导下，……人民群众能不能制服四类分子，敢不敢把四类分子的绝大多数人管起来进行改造，既

是衡量一个地方群众是否充分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彻底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这个地方的人民法院是否贯彻了群众路线的主要标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1964年12月26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的工作报告）。

据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讲话：仅1950年至1952年，四类分子的处决达70万人。杀戮高潮下幸免的四类分子，是持续被迫害17年之后，在文革中整体陷入绝境的。

再看“资产阶级”，从1952年开始，就被毛泽东判定：不再是中间阶级。而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对立面的“主要矛盾”。1956年公私合营的时候，把70万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划入资产阶级，加上近20万资本家。这是一个90万人的、从被“团结、利用、改造”，到越来越明确地被歧视迫害的“敌对阶级”。在文革前，他们的处境类似纳粹公开迫害犹太人的前夕，始终剑悬头顶。文革开始后，他们立即成为被扫入四类分子同等待遇的群体。

这是数量高达两千多万人的中国“犹太人群体”，而在纳粹上台的时候，整个欧洲只有一千二百万犹太人。

三，“犹太人群体”成为文革迫害迅速扩大的依据

他们有别于其他受迫害者，其原因是他们基本上是历史的身份罪，和种族一样，已经无可改变。地主富农在失去土地、资本家在失去企业、前政权军政人员在失去服务机构之后，属于个人的身份依然存在。迫害模式因这个群体的存在而建立：以身份加以标识，即使没有刑事罪行，也同样可以失去一切公民权利，成为“群众专政”即民众暴力的目标，没有生命保障；罪行可以任意编造，无需经过法律程序认证；你是否存活，完全依赖于“形势”——生存环境的暴力程度。文革前和文革中，干部民众先后有过“冤冤相报”的迫害可能，但在迫害和被迫害之间，并非没有一条清楚的基本界限。这条界限就是黑四类和资产阶级。这个红色恐怖的核心迫害对象，贯穿整个文革没有改变，他们所承担的罪名没有改变，迫害的模式没有改变。

这个受迫害核心和模式的存在，是理解受迫害群体数量在文革迅速扩大的根源。其他被迫害对象，只要以同样身份加以标识，就自动纳入这个模式。一个或

一类人，只是在取得“犹太人群体”的罪名之后，迫害者才取得任意伤害他们的权利。例如，四类分子在文革中被扩大为“黑五类”、“黑七类”，其中“黑帮干部”，是被指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教师、知识分子是被指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右派”，他们随即取得“犹太人”身份，进入了“犹太人群体”。少年儿童是被指控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狗崽子”而进入这个群体。不放过对少年儿童的迫害，也和纳粹德国的状况如出一辙。文革中，四类分子、资产阶级这一群体，由于对家属、包括子女的株连，被迫害人数就达到将近一亿。

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建立这个“犹太人群体”的理论，一直强调现代历史上政治斗争的相互杀戮，以国民党杀过共产党人为依据，作为文革暴力对待“犹太人群体”的充分理由：即“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假设此方不残酷对待甚至屠杀“犹太人群体”，就会被对方杀戮，而且因为不仅有关政党而且有关“阶级”，所以将涉及全部工农民众的“千百万人头落地”。

这些说法，都刻意掩盖了一个事实，就是在土改、镇反、肃反被杀的 70 万人和因此形成的两千万“犹太人”群体，他们绝大多数无涉国共政治斗争、无涉“革命反革命”对峙、与任何政治并无干系。他们被划入“敌对阶级”、被指控“站在历史错误一方”，只是一个政治陷害。绝大多数地主富农资本家只是合法拥有土地和企业的普通平民而已。

同时，由于文革涉及党内斗争，文革研究大多会注重介绍文革前以毛泽东刘少奇为首的高层，如何因经济等议题产生分歧，以解释文革一批干部遭受迫害的来由。但是这些研究往往没有同时指出：在以国家名义确立、迫害一个“犹太人群体”的问题上，在专政替代法治的问题上，他们并无分歧。先是大批与政治斗争无关的无辜平民可以被诬陷杀害，往前再走一步，才是同样与国共斗争无关的党内意见不同者，也可以被诬陷、推入同一深渊。没有法治，就没有“罪与非罪”的标准。

纳粹和文革浩劫的问题，是彻底毁掉法治基础，大规模诬陷滥杀与政治完全无关的平民。

四，“犹太人”和“雅利安人”

正因为有一条清楚划出“犹太人”的界限，因此，所有被扩大进去的被迫害对象，要逃离迫害，都是宣称自己被误会了身份，声明自己不是地主资产阶级同路人，也就是声明自己不是“犹太人”而是纯种“雅利安人”。最典型的，就是五十万“资产阶级右派”，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和四类分子资产阶级一起饱受蹂躏之后，争取“平反”的方式，就是竭力将自己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他们不会去尝试以解救同受迫害的“犹太人群体”的方式，同时争取自己的被解救。不仅因为这样做不可能成功，还因为 1949 年之后的反复政治教育，就是阶级斗争学说。在这个被普遍接受的学说之下，地富反坏构成阶级敌人，这个中国“犹太人群体”不可能消失。它不仅存在于专政迫害中，也存在于绝大多数普通“雅利安人”的心中。这些“身份罪人”的家属和孩子，也必须以“揭发亲人划清界限”、“宣布脱离家庭”来尝试规避迫害，而由于血缘关系，他们极少逃脱成功。

遇罗克作为一个典型的挑战体制的英雄，受到大家应有的推崇和纪念，我也看到，大家往往忽略了千千万万个与政治无涉、从来没有一丝挑战革命形势念头，巴不得找个地洞蹲在里面不要被人看见，却被少男少女们拉出去打死或被迫自杀的人。大量出现这样的受难者，才是浩劫。

文革研究一般都普遍注意并且提到了文革第一波对于地富反坏的冲击，但是，研究最关注的，往往是围绕中共党内政治斗争和社会上的派别斗争的主场景，而被迫害的“犹太人”，只是文革模模糊糊的背景。更为清楚的受害者，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大量革命干部、知识分子。他们也是文革后由政府主持的“拨乱反正”模式中应予“平反”的典型好人。

这个模式是：文革作为一种“错误”虽然是迫害了好人，他们却是被误认为是坏人而错遭迫害，文革灾难，就是把大批革命干部打成了“黑帮”，把大批革命知识分子打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一批革命干部子女打成了“黑帮子女”，把大批“雅利安人”打成了“犹太人”。那么四类分子和资产阶级呢，两千万中国“犹太人群体”呢？那条清楚的、受迫害核心群体的界限，在文革结束的时候再次出现。好、坏以此为界。“犹太人还是犹太人”，对中国“犹太人”的镇压还是对的。所以，在“好人们”欢呼文革结束的 1976 年，中国的“犹太人群体”还处在“不许乱说乱动”的地位。虽然对“好人”的甄别平反，也花了一段

时间，可是，在文革结束的那一天，他们就产生希望和信心，知道自己迟早是要脱离“犹太人群体”、被“平反”的。而在1976年，中国“犹太人群体”并没有这样的希望。因为，“拨乱反正”是拨文革中迫害的扩大之“乱”，是反到文革前的17年之“正”。虽然，文革的教训也渐渐引出对17年的一定程度的反省。在文革结束7年以后的1983年，又熬了大半个文革的时间，“四类分子”才获得公民权，而歧视理论和环境依在。他们处境的改善，只是党“胜利完成了”对他们的“教育改造任务”，而并不是说，他们从来就应该是人。

一方面，中国“犹太人群体”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被迫害和大批死亡没有被全面描述，导致文革浩劫的屠杀事实被掩盖了一大块；另一方面，“雅利安人”式的平反模式，使得文革的浩劫本质，变得更为面目不清。

文革中被陷害而划入“犹太人群体”的受迫害共产党干部群体，在文革后急于重返“雅利安”身份，他们的绝大多数人认为，自己“雅利安”身份的恢复，等同于“拨乱反正”的完成，他们并不改变原来对“犹太人”的迫害理论，这也使得对此持有异议的人，反感这些干部对文革前参与、支持迫害他人的不作反省，却又主导了文革后控诉的话语权，因而甚至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不愿意把中共干部在文革中遭受的大规模暴力残害，也看作与犹太人浩劫相同的迫害，甚至有人认为，民众对这些干部的暴力，是对他们在文革前执行专制政策的一种合理反抗。

我想，纳粹时期与文革浩劫有着共同本质，就是以独裁者煽动的民众暴力，对他意欲迫害的对象，实行大规模非法伤害和杀戮，这样的专政模式完全取代法治。在纳粹德国，独裁者把迫害对象认定为一个特定种族，在文革前和文革中，中国独裁者把迫害对象认定为一个特定的“犹太人”社会群体，在需要的时候，任意扩大这个群体，在政治斗争需要的时候，甚至不排除扩大到自己的昔日战友和支持者。这种暴力煽动，虽然有局部短暂的失控，但是从全局和本质上讲，文革中斗争共产党干部、甚至对他们施以暴力的民众，并非自由意志的反抗者，而仍然是被独裁者利用掌控的工具。对干部攻击的起始和中止、攻击的方式、干部被“保护”起来还是被“解放”或者继续留在暴力中，最终都是由文革的领导者决定，而不是由民众所决定。

因此，文革中的所有受害者，都是浩劫受害者的组成部分。而“犹太人群体”

仍然是浩劫迫害的核心。

五，文革研究中描述的失衡

迫害导致死亡的大量发生，是纳粹时期和文革时期的基本共同特征，也是它们在本质上一致的原因。

假如说，纳粹对犹太人迫害的浩劫，大屠杀是占历史描述的绝对主体。这样的主体描述对文革始终没有形成，倒是出现更多红卫兵那一代年青人的文字回忆。他们对文革的回顾反省、对自身群体的研究，无疑是必须的，但是，我也认为，在文革研究中，不应该出现整体表述天平的严重倾斜，失衡的原因是什么？

一个原因，当然是文革研究在中国还属禁区。这是和二战之后的德国非常不同的地方。希特勒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党都在一场侵略战争失败之后，退出政治舞台。新一轮领导人没有历史负担。而中国文革结束，是执政党自身变化的结果。文革结束是一个突变，而政党思维方式的变化却是渐进的。它的固有思维之一，就是很难容忍党外质疑，因此，对文革的所谓“拨乱反正”非常有限。

第二个原因，是在时过境迁之后，文革浩劫和犹太人浩劫，二者的叙述主体不同，源自幸存者的劫后遭遇完全不同。二战之后，犹太人痛定思痛，幸存者们能够集合起来求民族生存。为了让这个民族能够记住自己几近被灭绝的经历，更是为了唤起历来对犹太人充满歧视敌意的世界各国民众的反省，他们组成起大量民间组织、基金会，建立博物馆，集合民间资金，拍摄大量文献纪录片，把犹太民族的遭遇提升到人类悲剧的层面，把纳粹的迫害追溯到反人类罪的层面，才使得今天的浩劫教育成为国际社会认同的人类历史教训。

而中国的四类分子和资本家，即使在文革结束那一刻，他们仍然是黑的。1976年文革结束，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只是可以指望开始一个不能对他们任意打、杀的“讲政策”时期，有了较多人身安全，不至于在随时可能发生的“批斗会”上立毙杖下了。可是，他们的身份罪并没有任何变化。不要说“四类分子”，“资产阶级”仍然在文革后的经年累月中，成为一切批判目标的定语，例如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

文革结束两年多之后，四类分子和资本家被“摘帽”（全体恢复公民权是在

文革结束 7 年之后)。可是，“摘帽”并不是安全的绝对保障。“摘帽”不是法律确认这些人原本就是公民，理所当然拥有平等权利，而是执政党的一个宽恕决定。事实上，在决定中，没有检讨多年来无罪杀戮和剥夺两千多万人公民权利的政府罪行，而是赞扬自己以迫害的方式“改造”他们成功：

“经过做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他们的绝大多数得到了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九七九年元月，中央决定给全国六百多万名四类分子摘帽，恢复了他们的政治权利。一九八三年后，国家又给所剩的 79, 504 名地、富、反、坏分子中的 78, 327 名搞掉了帽子，并纠正错戴四类分子帽子的 982 名，对有现行违法犯罪行为的 195 名，分别予以逮捕或劳动教养，从而胜利完成了自解放以来对两千多万名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教育改造任务。”“八三年后国家又恢复了近八万名四类分子的公民权”。(引自 2004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

在 1979 年 1 月 11 日，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说：“地主、富农分子经过 20 多年以至 30 多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中央决定：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

首先是对“劳动改造”迫害的肯定，再以“群众评审，县革委批准”的程序摘帽，如此“摘帽”，自然带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的“反动立场”是“天然”的，只是现在，“经过群众评审”，主观判定你在“劳动改造”之后“改变了立场”，把你划出这个群体。可是，“专政”仍然留在宪法中，在可能发生的另一个“中央决定”、“群众评审”中，你当然可以再被划回来，因为几十年的迫害本身没有被否定，形成迫害的理论没有改变。

在土改时期被镇压杀掉的地主，在镇反肃反中被处决的反革命不算，从 1954 年到 1979 年的 25 年中，有 70% 的四类分子，一千多万人消失了。他们的死亡率远远高于正常死亡。犹太人在浩劫中的死亡，是六百万人。

我们设想一下，假如是犹太人幸存者刚刚走出集中营，从温和化了的前纳粹政府手里拿到这样一张摘帽决定，而他们还必须在德国生活下去，无法离开，犹太人怎么可能给世界带来今天的浩劫反省？不会的。就像直到我们感觉已经经历

了天翻地覆变化的今日中国，试想一下，是否可能出现一个类似“犹太人浩劫基金会”、“犹太人浩劫幸存者协会”那样的中国“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资产阶级浩劫基金会”、“中国黑五类文革幸存者协会”？没有可能。因为在今天的中国，根深蒂固的文革思维仍然在起作用。从官方甚至民众来看，打出这样的身份，就是“没有改造好”，“企图变天”的证据。而这些幸存者仍然生活在长期迫害后恐惧的阴影之中。他们仍然是被政府宽大的、改造好了的罪人，而不是理直气壮的浩劫受害者。德国浩劫的受害主体，是站出来质疑人类良知的整个犹太民族。中国文革的受害主体是零散地消失在人群之中、不希望被人注意到的、一个又一个的幽魂。

（这也是我想发出这篇旧文的主要原因，前面的话写在 2004 年，6 年后 2010 年的今天，不仅这个状况没有改变，在建国 60 周年的去年，宪法中保留的“专政”被高调肯定，仍然没有出现讲述中国“犹太人群体”的文革文献片，而中国“犹太人群体”幸存者，已经基本离世。）

就这样，本来应该站出来、对文革浩劫的历史传承负起责任的受害主体，中国的“犹太人群体”，在历史叙述中始终缺席。

六，叙述主体无法替代

托玛斯·曼在二战刚刚结束时说过：“希特勒把德国变成了一个刑讯室。”在文革中国，这是一个远为广泛的事事实陈述。德国对犹太人的杀戮主要通过集中营由军人执行；而文革中，中国城市的每一个工作单位，每一个居民区、每一个大、中、小学校，农村的几乎每个村庄，都在发生人身侮辱（斗争会）、非法羁押（隔离审查）、体罚和刑讯。被打死打伤和不堪折磨的自杀死亡大量发生。大量平民广泛涉入暴行，红卫兵只是冲在最前面的其中一批。

文革和红卫兵的兴起，只是政府把原来就存在的对“犹太人群体”的“群众专政”权限扩大、专政范围扩大，把任意侵犯掠夺他人财产、刑讯、监禁、处死和酷刑致死他人的权力，下放到普通民众、包括正在青春期的青少年手中，激发起人的兽性一面，教育使他们认为，残暴行为只要假借革命名义，就是可以的。在这一点上，文革中的中国也和纳粹德国契合。《八、九点钟的太阳》引入了红

色教育中的电影示范，在红卫兵一代看的国产电影，斗争地主的羞辱、暴力，是一个常见场面。

文革中对老弱妇幼施以刑罚，显然不是源于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只不过是被异常气氛激发起来的虐待狂心理和兽性。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十几岁的少男少女会想出那么多折磨人的花样，为什么正常人无法忍受的残酷，会成为嗜好，甚至带有娱乐和庆典的特征。暴力蔓延的更重要原因，是政府只利用所谓“法律”对“敌人”施加迫害，而没有任何正常社会中法律对侵害生命财产罪行的惩罚，文革只是长期迫害“犹太人群体”的制度性扩大。

很难否认，在纳粹德国，青年一代也有和红卫兵一代近似的政治迷幻。在《八九点钟的太阳》摄制组建立的同名网站上，首页有一幅照片。是文革中的一个家庭，在两三岁孩子的指挥下，一家人从小到大排成一列，高高兴兴各拿一本《毛主席语录》。在最近描写纳粹迫害同性恋的纪录片《Paragraph 175》中，有一个几乎完全相同的场景。影片中，一大家子德国人高高兴兴地在自己家花园前从大到小排队，然后，微笑着，一起行希特勒式的举手礼。两个场景如实传达了同样的政治迷幻在不同国家的社会中扩散深入的程度。

在德国，被虚幻政治理想和纳粹教育蒙骗的一代人，无疑也有大量事后觉醒者，也有和红卫兵一样反省社会教育、心路历程的需要。可是，在对整个浩劫反省中，这部分比重相对要轻得多，甚至微不足道。原因之一是，人们认为：面对大规模屠杀，不论那些参与者最初怀着怎样的政治理想，在屠杀发生时，只可能是人的兽性主导。这种兽性是被什么催化剂催成的，已经很少有人关心。这部分探讨弱化，也因为纳粹教育已经随纳粹政权一起消失。在今天德国教育中，哪怕出现任何一点相关迹象，例如，集体主义、要求思想的整齐划一、鼓励对政党和领袖的效忠颂扬等等，都会遇到非常敏感的本能警惕。

而中国情况完全不同，“国庆 60 年”前后，文革前那些“三忠于”英雄和教育模式，又在对今天孩子推出新一轮版本来。所以，对革命教育的检讨，对今天的中国青少年仍然有现实意义。

但这又是非常纠葛的议题：一方面，寻求暴力形成的教育原因，无疑是重要的。另一方面，之所以重要，因为它的后果是严重的反人类罪行。在整个文革研究和文献片领域中，由于政府阻扰采访以及“犹太人群体”的恐惧，反人类罪行

事实不清，相对于德国浩劫，文革面目也就模糊不清。

例如，根据严家其、高皋写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从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北京东郊大兴县13个公社共杀害地主富农及其家属325人，年龄38天至80岁，22户被杀绝。根据目击者回忆，其中的马村“在村内东、南、西、北四方设四个监狱，分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监，另设一个刑场，随捉随入，随提随审，随杀随埋，真乃一条龙行事。”

（张连和“五进马村劝停杀”。很难想象，在德国犹太人浩劫之后，这样的事件会不成为今天广泛的浩劫教育范本。而大兴县受难幸存者却一言未发。公开采访这一事件仍然是被禁止的。据《八、九点钟的太阳》剧组介绍，他们有采访意愿，并做了努力，却没有采访大兴县屠杀事件的可能。

清楚看到人类群体灭绝的后果，是德国对任何纳粹教育倾向敏感的前提。假如浩劫本身面目不清，发掘其原因的意义也就随之弱化了。文革主体叙述消失，好比在叙述德国浩劫时，缺少或者弱化了犹太人遭遇。

叙述主体缺席，出来讲述研究文革的，就多为红卫兵这一代，其中有施暴者，也有一个相对温和的群体。通过他们，是否也能对文革深刻反省呢？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叙述主体不同，关注点也必然不同。

当一个过去的施暴者面对公众（也等同要面对自己的亲属后代），会很自然出于本能回避自己曾经有过的暴行细节。关键是，他们根本无从表达他们从未有过的被伤害和被恐怖淹没的经验。

我举一小段经历恐怖者对文革的叙述，那是湖南浏阳一中84岁老教师龚雨人2001年的回忆：“红卫兵，其实就是浏阳一中的学生，用绳子捆着我爱人唐政去浏阳一中大礼堂斗争，我和浏阳一中几个家庭成分大的老师坐在下面陪斗。我眼巴巴望着她挨骂挨打，看着看着她站不住了，倒在台上。红卫兵还去打她，骂她装死。我惊叫一声，也被红卫兵打倒在地。批斗会散会后，我把她背回家就死了。真是昏天黑地。我的大一点的儿子被捆吊在房门口的树上，两个小女孩吓得走出去了。我的双手被反捆着，学校用几块木板钉个箱子，把唐政老师丢在里面，一些学生向尸体吐痰打瓦片。当时浏阳一中的校长赵一安站在旁边，我向他叩头，请他制止，他说是革命行动。就这样用绳子捆着我去埋了我的爱人唐政老师。”

这是恐怖体验，这样的主体叙述红卫兵一代永远无法替代。不论是历史场景中，还是现在，施暴者和受害者的双方感受显然是不一样的。

在主体叙述缺席、施暴者不可能出来承担的时候，最容易出来回顾文革的，主要是当年红卫兵一代年青人中的温和群体。他们和党文化的关系演进，类似互为推动的信仰与对党和领袖的恋父情感，最终又因欺骗被揭露带来信仰情感双重崩溃。这一群体的反省主题通常引入“理想主义”。

结果，文革浩劫的叙述大图景出现偏差。中国“犹太人群体”的遭遇、文革浩劫本质的暴力、杀戮和因此带来的恐怖，没有机会被充分表述、告之世界和中国后代青年。而红卫兵一代中温和青年群体的感受回顾、文革中各种人的复杂状态和心态的发掘，文革风云人物的自述自辩，甚至对文革发动者的“理想主义追求”的探讨，鱼龙混杂，越来越多，本来希望通过探讨文革“更复杂层面”，因而收获“更深刻反省”的初衷，在屠杀现实的前提缺失下，复杂探讨的分寸无法把握，反而容易流于片面与碎片化，最终事与愿违，淹没了最基本的是非判断。

总之，中国文革对比二战后犹太人的浩劫叙述，差别显著。德国人认为：揭露暴行本身，展现暴行的大量牺牲者，是最主要的“牢记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被屠杀、灭绝的历史悲剧”的方式，也是“锲而不舍地追寻悲剧根源、防止悲剧重演”的反省依据。我认为，这样的方式显然也适用于中国文革。

可惜的是，即使我们想沿用犹太人反省的模式，由于中国“犹太人群体”的缺席，也根本无法实现。

在本来就为数不多的文革研究中，文革浩劫受害者的核心，一个中国“犹太人群体”的声音，他们在浩劫中经历的无可逃避的深重恐怖，在红卫兵暴力下的大批死亡，甚至在文革结束时依然无法消除的绝望，没有被强调。而那是这段历史中最基本、分量最重的东西。

最后，我想提一下自己翻出这篇旧文的另一个原因：今天，当年年轻一代成为文革回忆和研究主角的局面依旧。同时，今天也有红卫兵出来因事实误差为自己是否参与暴行进行辩解，我想，就个人层面来说，任何人都有澄清事实、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文革推行的，就是任意举罪却不容辩解的思维方式，因此，今天当然不能以文革方式来反对文革。可是我也想到，就整体层面来说，文革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60 年的历史叙述，都在政府干预下严重失衡，而这种失衡

再也无法弥补。红卫兵还可以为自己被误会的罪名辩护，甚至为自己的文革心态作出他人无法证伪的辩解，而中国的“犹太人群体”却从来没有得到为自己被诬陷罪名辩护的权利，他们一部分被消灭、余下的幸存者，也在得到发言机会之前，就已经默默地、永远地消失了。

原载《明报》月刊 2010 年第 10、11 期。

【小资料】

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文革武斗中死难同学名单

老 舟整理



张光耀

高 66 级学生。815 派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勤务员。1967 年 8 月 3 日两派在校内武斗，得知参加武斗的 815 派石油学校一学生中弹倒在操场上，徒手前去救护时遭对方射击，中弹身亡。

孙渝楼

高 68 级学生。815 派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成员。1967 年武斗时驻南岸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8 月 22 日在反到底派攻打南岸上新街 815 派据点时，为掩护其他人员撤退，只身断后，中弹身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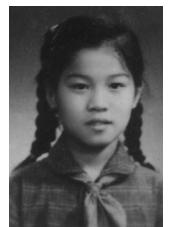
欧家荣



余志强



唐明渝



杨武慧



崔佩芬



李

元秀

高 68 级学生 初 66 级学生 初 67 级学生 初 68 级学生

六人均系 815 派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成员。1967 年 8 月 4 日帮财贸 815 总部搬家时，在财贸俱乐部门口遭遇反到底派武斗队突袭，中弹身亡。其中年龄最小的杨武慧年仅 14 岁。



胡廷荣

高 66 级学生。反到底派二十九中红一方面军成员。1967 年 8 月参加后字 242 部队（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武斗时被乱枪击中背部，瘫痪近一年后去世。

李永和

高 66 级学生。反到底派二十九中红一方面军成员。1967 年 8 月驻守市体育馆时，因其所在武斗队武器较好，被同一派的另一武斗队前来抢夺武器时中弹身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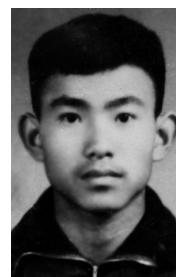


颜继禄

高 68 级学生。反到底派二十九中红一方面军成员。1967 年 8 月驻守二十九中背后市中区警报台制高点，被八一五派五一技校和石油校武斗人员冒充反到底派人员前来抢夺武器时中弹身亡。

曾令荣

高 66 级学生。反到底派二十九中红一方面军成员。1967 年 8 月参加嘉陵江大桥南桥头武斗中，见八一五派丢弃的阵地上有一挺机枪，前去捡拾，被反到底派误当八一五派人员打死。



说明：这只是该校学生在文革武斗中的死难人员名单，另有死于文革武斗中的教师未包括在内。本名单中的 815 派死难同学均埋葬于重庆市沙坪公园武斗死难者墓群中，该墓群现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编读往来】

1、本刊第 65 期“文革电影专辑”所载张郎郎的访谈《海默之死》及其个人简介，未经受访人张郎郎先生过目。特此说明并致歉意。——《记忆》编辑部

2、蒋健谈 2010 年十件事中的毛新宇：

《记忆》第 66 期《2010 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件事》一文提到署名“毛新宇”的文章《我爷爷发动文革是为了消灭四人帮和林彪》，显然，该文作者认为这个“毛新宇”就是毛泽东唯一的孙子：毛新宇少将。实际上，《我爷爷发动文革是为了消灭四人帮和林彪》就是一篇恶搞文章，别出心裁地把动辄“我爷爷”的毛新宇之颟顸夸张到极致罢了，当不得真的。

另外，《2010 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件事》说“在 8 月 10 日的凯迪社区/史海钩沉网上发表了署名‘毛新宇’的文章”也不准确。事实上，凯迪社区/史海钩沉上标得很清楚，此文只是“转贴”，其 ID 名并非“毛新宇”。需要说明的是，这类恶搞文章常常找不到源头，各个论坛或博客都只是注明了“转”。详见如下网址：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boardid=64&id=6383834>

3、陈仁德谈周七月文并纠错

新年第一期开头很好，周七月的回忆文章以冷峻平静的笔调写来，远胜那些剑拔弩张的文章，看后半晌说不出话，沉痛不已。

文章中有两处小误：

一是“毛泽东仿朱元璋‘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的主张提出了‘深挖洞，广积

粮，不称霸'的口号”，其实，那不是朱元璋的主张，而是朱元璋采纳了朱升的建议，内容也不是“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而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二是“1976年1月10日，总理逝世”不确，应该是“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